

記 憶

REMEMBRANCE

2008年10月6日

第四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文革起源研究

余汝信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毛刘问题

江青研究

王广宇 在中央文革办事组与江青打交道

阎长贵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

书评与序跋

周伦佐 青春琴弦上的叛逆声音

周伦佑 破镜中成长的诗歌青春

附录：周伦佑文革时期诗四首

昨日心迹

陈懋智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二）

故纸堆

197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给一个外国留学生的大字报

简讯

宇 峰 北京部分学者研讨华国锋主政历史

湘 宾 《青春无痕》已被韩国购买版权

小资料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编读往来

- 1、陈家琪谈文革
 - 2、余汝信纠错
 - 3、余汝信建议
 - 4、阎长贵答胡小水
 - 5、单少杰惠赐大作《宗凤鸣先生谈赵紫阳思想》
-

【简讯】

北京部分学者研讨华国锋主政历史

宇 峰

九月二十六日，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就华国锋主政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参加会议的有：郑仲兵、姚监复、高瑜、韩钢、胡少安、阎长贵、林京耀、蒙木生等。

与会者认为，对这位宽厚的前中共领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是非功过，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是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反思当初的历史过程，从各种角度总结经验教训，意义十分重大。

会议主持人郑仲兵指出，华国锋的与世长辞，唤起了很多人对他的特殊的悼念之情。特别是他沉寂近三十年来，人们通过对他之前之后的领导人的观察和比较，感触良多。当年加给他头上的三项主要帽子：“两个凡是”、“洋冒进”、“个人崇拜”，现在回顾起来，都需要重新审视。包括当年一些激进地批判“两个凡是”的理论精英们，都对此有了新的认识。比如，如果他真搞了“两个凡是”，就不会抓“四人帮”，就不会让邓小平复出，就不会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就不会搞重点转移，等等。

与会者在讨论中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历史作用；华国锋是否“阻挠邓小平复出”；所谓“两个凡是”问题的来龙去脉；华国锋是否压制过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华国锋在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中的作用；所谓“洋冒进”的历史背景和是非功过；华国锋与对外开放；宣传“个人迷信”问题。

【文革起源研究】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毛刘问题

——读《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笔记

余汝信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赵家梁、张晓霁著，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本文所引该书文字皆出自此版，只注明页数）。

这是近两年来最值得一读的一本书。

“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党内斗争的首要大事，至今没有得到公正评价。本书在披露这一被重重帷幕遮盖着的事件内情的同时，向人们提供了作者自身的思考。

赵家梁（1920—2007年），1952年任高岗秘书，1954年任高岗管教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他从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者转变为高岗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这一转变为本书提供了客观性。

本书涉及史实是多方面的。本文摘录的是书中描述的自建国以后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考量、对刘少奇态度的演变以及高岗在此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一、事件演变梗概

本书认为，“高饶事件”实质上折射的是毛泽东的接班人问题，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问题。

本书浓缩概括后的事件梗概如下：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并开始考虑新的助手和接班人。相比之下，毛泽东对高岗信用有加。他曾明里暗里向高岗透露过自己对刘少奇不满，以及想叫刘少奇“挪挪位子”，当议长或国家主席等打算。于是，高岗就出来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他以为这是帮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看一下“文化大革命”

中所揭露的那些关于刘少奇的“罪行”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只不过在 1954 年，高岗散播的反刘言论，都被说成“造谣”、“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是要“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的“反党阴谋”。高岗正是因此而落马。

1953 年夏秋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毛泽东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划线，把刘少奇划入“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准备”的人，并对其“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大加伐斥。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第一次公开交锋。然而，他遇到很大的阻力，在相持了几个月之后，暂时让步，转而强调团结。

到了 12 月，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高岗，而且给他定了个“要造反”、“想当万岁”的罪名。从此，高岗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个转变实在太，太突然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泽东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个中奥秘和实情，本书将一一缕述。（ III—IV 页）

二、毛对刘越来越不满意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在中国，由斯大林逝世引出的问题是，六十岁的毛泽东“之后”怎么办？

于是，在中央高层，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成为 1953 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呢？

“七大”以来，刘少奇一直被公认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105 页）

作者认为，毛与刘从相识到最后彻底决裂，经历了整整五十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 1943—1953 年，他们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泽东很器重刘少奇，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进一步了解他、考察他。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由不怎么满意，逐步发展到想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这个阶段对刘少奇来说十分重要，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107 页）

这期间，毛泽东在十分器重刘少奇的同时，开始对刘少奇有些看法，特别是党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日益不满。

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1945 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

1947 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

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

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

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107—108 页）

三、高岗很被毛看好

与刘少奇相比，高岗却很被毛泽东看好。毛泽东认为高岗对他的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少奇右倾“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岗却大加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样板田。而高岗则由于毛泽东的赏识和推崇，显得与众不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把高岗看成毛泽东的“心腹”。

从 1935—1953 年，从陕北到北京，毛泽东对高岗一向很器重，一手提拔。毛泽东曾说过，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推举高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央曾经考虑派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去苏联参加吊唁和葬礼（后来是派周恩来去的）；6 月，苏共发生“贝利亚事件”后，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这时的高岗备受毛泽东的器重。这种器重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好像老人家重用他”。（108—109 页）

作者认为：

毛泽东和高岗有着相似的生长环境与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风都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109 页）

但是，作为政治家，毛泽东远非高岗所能比。毛泽东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巧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

之中。……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泽东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又细心地观察、考验他们，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少奇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110—111页）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泽东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他们二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高岗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111页）

四、“私房话”与绝密任务

高岗1952年10月到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保留原有职务。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

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泽东说他讨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111-112页）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114页）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114页）

五、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毛泽东交办的绝密任务，高岗迫不及待地告之了他特别信赖的陈云。高岗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了怀疑。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

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114页）

高岗与陈云多次交换看法。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115页）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如下的谈话内容：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

“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

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115—116页）

惟高岗事发，陈云是另一个说法，称高岗为了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了“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称，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孰是孰非，今天已是死无对证了。

六、“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作者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泽东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的重要转折点。

此事传说甚多，以下为作者引述高岗的一种说法。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118页）

作者接下来说：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订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

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118页）

此即为以后所说的“批薄射刘”。

作者称：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得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泽东谈，也没有在中央的会上谈，更没有找刘少奇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应该向毛泽东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120页）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和警惕。（121页）

形势自此急转直下。

七、“自铸大错”

作者认为：

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又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

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建议，心甘情愿担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洩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122页）

1954年2月17日，高岗开枪自杀未遂，即被实施“管教”。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据说，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

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258页）

毛泽东遗憾什么？他是假惺惺还是真遗憾？

八、高岗虽死，毛与刘的斗争却了犹未了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

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251页）

1955年7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点的是邓子恢的名，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252页）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让陆定一组织人起草、并经刘审定的。毛不赞成，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252页）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252页）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郑重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邓小平是副帅。毛早就已经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252页）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泽东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少奇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岗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252页）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254页）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255页）

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

场顶了起来。（256页）

例子太多，已难一一枚举。

作者说：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256页）

九、文革：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被定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第二位滑落至第八位。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公报宣布：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肃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全会通过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审查报告》列举了“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其中“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称：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

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证据”，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极秘密地调查过。十五年后，终于派上用场。

作者称：

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注：指刘少奇）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了整整16个年头。（257页）

作者以上所说大抵都没有错，唯一需要更正的是——“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的，不是什么“造反派们”，而是毛泽东所操控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及8341部队。

2008年9月

【江青研究】

在中央文革办事组与江青打交道

王广宇

作者简介：王广宇，男，1930年生，马列主义研究院研究人员，1966年6月调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1967年1-8月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

1966年夏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新一轮阶级斗争即将开始的时刻。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阴差阳错地被卷入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一名办事员。

我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1967年初，我被中央文革小组个别成员封成“办事组长”，既无任命文件又没向全体工作人员宣布。由于我无权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日常工作不得不循规蹈矩，以小心不出差错为最大幸事。

考虑到我这个负责人工作的困难，戚本禹被指定主管办事组，由他传达中央文革小组的决定和指示，重要的事情直接向他请示报告。他怎样布置工作，我们就怎样去执行。我们都把他当成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工作人员发号施令的人。这一点在工作人员中没有人怀疑。通过我的耳闻目睹，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最受江青信赖，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有来头的。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对执行小组的决定都很坚决，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们这些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一心一意、埋头苦干，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根本没有考虑过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边工作会有什么“路线问题”。我们都自认为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执行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然而，悲剧就发生在这里。在中央文革工作的工作人员中工作越多，任务完成得越好，下场越惨。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事组值班室的七个人，其中五个人——王道明、矫玉山、张根成、王广宇、周占凯被江青先后投入监狱，两个人——姜材熙、李奎林被审查多年。文艺组、宣传组、理论组、档案组、记者站、办信组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何罪之有？他们整天在中

央文革领导的眼皮底下，俯首贴耳地、胆战心惊地为这些“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服务。可是，首长一翻脸就把这些人先后一个个投进了监狱，罪名都是“莫须有”。

说到“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有权威最可信赖的代名词，因为它是冠以“以毛主席为首”这个特称的，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誓不两立，针锋相对的概念。能够沾上“无产阶级司令部”边的人，一律都是“革命左派”，挂不上的就是“保守派”。这种划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各派红卫兵捞取政治资本的标准。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就是中央文革小组。

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实际上是“第一组长”，她从来就没把组长陈伯达放在眼里。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她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内部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她动辄就训人，就要横，小组成员中不论老的少的都得让她三分。至于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在她眼里只不过是奴才，对工作人员训斥是家常便饭，只要她不高兴了就拿工作人员撒气。我对这位领导的态度是“畏而远之”，只要她不点名叫我，我绝不同她打交道，能躲就躲。有时实在躲不开，叫她碰上了，见了我就先批评，然后再说事。下面我把印象最深的、同江青直接打交道的几件事说给大家听。

服装问题

1966年7月下旬，中央文革办公室刚从钓鱼台十一楼搬到十六楼没几天，戚本禹从中南海打电话给办公室，让我们通知服务员赶快把大客厅的室温调好，说江青马上来十六楼开会。戚本禹交代，让办公室的几个人和管理员作好准备，迎候江青同志的到来。这是江青文革开始后从上海回来第一次来钓鱼台。

我从未见过江青，也想见见，加上工作关系，又出于礼貌，我和矫玉山在十六楼门厅迎候这位“第一副组长”。不一会儿，中央办公厅九局二处的警卫人员先步入大厅，随后，江青在戚本禹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江青穿了一身黄呢子军装，头戴红五星军帽，脚登一双黑皮马靴，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紧随其后的是警卫员孙立志，护士许春华，服务员小张等一干人马。这些人一律穿着崭新的军装。我和矫玉山站在门厅旁恭候。戚本禹陪江

青走近我时，向江青介绍我说：“这是王广宇！”江青用戴着黑框眼镜的眼睛打量我一下，脱口而出一句：“怎么！是穿黑衣服的？”其实我穿的是藏蓝色卡叽布中山装，不是黑色。戚本禹对这句话没有理会和解释，江青就匆匆地走向大客厅。这是我同江青首次见面，她甩给我的第一句话。

江青嫌我穿黑衣服，说明我们的穿着使她看不惯，为了适应她的需要，我们向戚本禹反映，让工作人员一律换成军装。戚本禹原以为工作人员换军装不是大问题，没有反对。可中央文革小组开完会，戚本禹回值班室却说，“江青同志不同意都换成军装。”我们向戚本禹力争：“你们小组成员都穿上了军装，首长的秘书、警卫、随员也都穿军装，而我们工作人员整天为你们服务，同你们一起出去开会，我们穿蓝衣服，同中央文革的穿戴不配套。”

实际上，江青那时对中央和地方干部早存戒心，她用穿军装来表明对军队的信赖。当时，绿军装成为革命的象征，穿军装就意味着是“左派”，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所以文革开始后，特别是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以后，穿绿军装成为一种时尚，红卫兵们千方百计地到处找旧军装。

在工作人员的强烈要求下，戚本禹答应可以从总政领一部分军装，作为外出工作服，谁跟小组成员出去就换上军装。办公室从总政领来大、中、小号军装共十几套，作为公用服装，不固定给个人。这样，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主要工作人员才算有条件地穿上了军装。

电话问题

江青刚刚从上海回来时，到十六楼开会有时候路过值班室还进来看看，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有时在大客厅开会，还到值班室的红机子上接打电话，值班室固定的三、五个工作人员她也熟了，对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还不太防备。由于首长的随员秘书、护士、警卫要随时伺候，他们不能离会议室（大客厅）太远，而十六楼又没有空房给首长的随员做休息室，这些随员们也都集中在值班室准备随时听使唤。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陆续增加，江青发现生面孔的人多了，有的她不认识。有一次，江青来值班室接电话，发现值班室人多，乱哄哄的，勾起了她的无名火，她大声斥责：“我打电话你们在这里干什么？都出去！以

后我来打电话时，不需要你们在场！”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和随员们一个个乖乖地退出值班室。从此，便形成了一个制度，只要江青到值班室来打电话，工作中人不管手头忙什么，一律放下手中工作退出值班室回避。

十六楼值班室是小组成员去大客厅开会必经之处，值班室的门总是开着，一是便于小组成员交代事情，二则什么人经过门口去会议室可以有个关照。1966年秋天以前，办公室的三个组（文电组、简报组和调查组）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十六楼一层，人多房少，办公室都兼作卧室。办公室的值班室设两部红电话机，两部普通电话机，上、下、左、右，红卫兵的电话不断，都要人接。值班室又要为会议准备文件和开会需要的材料，有重要事情要随时向小组成员报告，小组成员也不时来办公室交代办各种事或发通知，值班人员要处理的事务不胜其烦，因此值班室给人感觉太乱。有一次江青又来值班室，看见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接下边红卫兵头头打来的电话，好像是请示什么事，在一旁的矫玉山向江青报告，自从中央文革电话向社会公开后，红卫兵来电话问各种问题不断，我们都无法答复。江青听后马上说：“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对下边来的电话和请示报告，一律不准擅自答复和表态，只能向小组反映请示和报告。”

从此，凡是中央文革办公室收到的请示报告，接的电话，都要做成电话记录，重要的随时送小组成员批示。一般的来电话都以“向上反映”来处理。江青的这条“指示”，成为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制度。

由于办公用房太少，电话多，互相干扰，办公室在十六楼的小客厅（紧挨大客厅）安装了一部长途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一手拿耳机一手作记录，时间长了实在吃不消。我们请中央办公厅电话总机的技师帮助，在电话机上安装一个扩音器和麦克风，使接电话的人免受手拿耳机之苦，腾出手专做电话记录。安装没几天，突然有一天开会中间，江青找人谈话进了小客厅，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因大客厅开会，停止了接电话。江青谈完话，突然发现了在小桌上放着电话，扩音器、麦克风，她大吵大嚷地回大客厅指责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偷听她的谈话。正在开会的小组成员都出来到小客厅看“窃听器”，质问我与矫玉山为什么安“窃听器”。小组成员还当场作试验，看能不能窃听。我和矫玉山再三解释，安的不是窃听器，是电话的扩音器，是接长途电话用的。他们查了半天，无法窃听，这才作罢。

江青第一次说我“不精神”

1966年10月，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清算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在大小会上作记录，晚上回来整理记录写简报。这个会虽然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但原中央书记处已经无法主持工作了。由尚未被打倒的大区书记主持小组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军队系统由几个副总理和元帅主持会，设立了简报组，主要是组织大小会记录，编发会议的简报，多数是发言稿的摘登，发给全体与会人员。而列席这个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分别编入各组，他们则另外组织一套班子，由中央文革派几个人作记录，自己编另外的会议简报，这份简报只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几个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的成员。这套简报的特点是短小、简练、不登已整理好的书面发言，重点放在会议参加者的即兴发言和会上的各种插话上，即所谓“拾遗补阙”。

在这次会上，最后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作了讲话，林彪也讲了话，会议的主报告是陈伯达作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个月的总结。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刘、邓也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在会上还对刘、邓说，“谁要打倒你们？我才不要打倒你们，有错误检讨就是了。”（大意）直到1966年10月末，刘、邓的问题还只是在党内高层中批判的。我也感到刘、邓还是党内问题。

在最后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中央文革派杨子才、阎长贵和我在大会上作记录。大概是会议开完后的两天，我刚刚整理好毛主席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突然发起40多度的高烧，已经烧糊涂了。办公室的同志把我送进301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扁桃腺发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住进一个有三十多个床位的外科大病房，床挨床，经打针吃药，住了大约不到一周后出院。说心里话，我是太累了，真想趁机回家休息几天，可是主管我们的小组成员不同意我回家休息，让我在钓鱼台休息。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下我能休息吗？实际上还是拖个疲惫的身子继续为他们卖命罢了。

医生嘱咐我，出院后继续休息一段，吃流食。遵医嘱，我只好一天三顿吃挂面汤。有一天中午，工作人员已经开过午饭，我到小食堂去吃病号饭。服务

员刚刚给我端上一碗热汤面。突然江青在戚本禹陪同下进了小食堂，要吃午饭，他们进来，我猝不及防，便赶紧大口吞面，想赶快离开小食堂。没想到江青凑到我桌前坐下来，端详我狼吞虎咽的狼狈状。然后说：“不着急，慢慢吃！”接着说，“我怎看你总像睡不醒似的，年轻轻的，这样没精神。”我无法解释，因为我的确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这时，戚本禹过来帮我打了圆场，戚本禹说：“他生病了刚刚出院，还没恢复过来。”江青缓和下来询问我是什么病住院，我告诉她是扁桃腺发炎，发高烧。江青一听，话就来了，她对我说，解放初期她也害过扁桃腺发炎，也常发烧，后来医生给她作了扁桃体摘除手术后，就好了，再也没发过炎。她建议我把扁桃体摘掉，我唯唯称诺。聊了一会，她们要开饭了，我趁机告退，这是江青第一次说我“不精神”。

办公室改办事组

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所在的十六楼，肖力，即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贴了一张小字报，不仅在办公室工作人员引发了一次波澜，也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视。肖力批评办公室工作“杂乱无章”，“不得要领”，无法适应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江青等小组领导也觉得办公室的工作不得力。他们认为原因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任办公室的领导，无法集中精力管好办公室，于是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律不再兼任办公室的领导工作。

不久，从解放军报社调来记者部主任宋琼改组办公室。大约是1966年年底，宋琼提出了改组办公室的工作方案，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首先，将中央文革办公室改名为中央文革办事组，这是文革期间全国第一个使用“办事组”的名称。其次，加强办事组的集体领导，组成了以宋琼为组长，陈满池为副组长的办事组，这个组的成员共五名，除正副组长外，还有杨子才、张文荣和王广宇。办事组集体直接为中央文革小组服务，管理整个办事组的日常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过去重要情况随时一事一报，小组领导嫌麻烦、琐碎。办事组成立后创办了《要事汇报》，把每天重要的情况及时打印出来分送给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及小组成员和个别列席小组会的人。《要事汇报》不定期，有时一天一期或几期，有紧急、重要情况随时上报。此外，还加强了对记者站的领导，把原来由解放军报记者组编辑的、以中央文革办公室名义出刊的《快报》同记者

站合并，由记者站统一编辑出版《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宋琼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每次会前，宋琼要把每日要事，需要提交小组讨论的文件先向陈伯达、江青口头汇报，由陈伯达、江青决定小组会的内容和参加人。这套会前汇报形成了制度。

宋琼主持办事组工作，大约有一个多月，就被以肖力为首的解放军报社造反派抓回解放军报批斗，办事组两位原解放军报社的成员杨子才和张文荣也同时被揪走。这样，办事组的五个成员中，解放军报社调来的三位被打倒，办事组副组长陈满池在记者站工作，未到任。原来的办事组成员只剩下我一个人。戚本禹在宋琼等被揪回解放军报社后，对我和矫玉山说，要我们两个把办事组的工作抓起来，并口头封了我俩为办事组正副组长，但是我俩不能列席小组会。

江青第二次批评我“不精神”

王力、戚本禹在宋琼离开办事组后，一再向我和矫玉山交代，办事组日常工作不能间断、停顿，一切工作照常运作。“萧规曹随”，开始两天，在开小组会前，我遵循宋琼的工作程序把当天重大情况打成《要事汇报》，和需要小组领导审阅的文件都夹到卷宗里，送到大客厅会议室，然后把卷宗放在陈伯达、江青的座位的桌子上，就赶快离开会场，他俩也没让我口头汇报。

大约是第三次，小组开会前，这次陈伯达、江青破例提前来到会议室，其他小组成员还没到，我又拿着卷宗进去，江青见我后，让我坐下谈谈今天有什么重要事情，我按《要事汇报》的内容复述了一遍，江青似乎没有认真听我的汇报，又端详我一阵子后开口说：“我一见到你就想批评你，怎么年轻轻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总像没睡醒似的？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做好工作？”我无言以对，只好愧疚地低下头接受批评。这时陈伯达的问话把话岔开了。陈伯达问江青：“他（指我）是办事组长吗？”江青向陈伯达摇摇头，没说话。我看开会的小组成员陆续到场，便向他俩告退了。这是江青第二次批评我“不精神”。

我受江青的窝囊气实在感到太冤。难道“不精神”也是罪过吗？再说我每夜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甚至连轴转为小组服务，我能打起精神吗？这次被江青批评后，我找到了戚本禹，请他换人，我没条件和能力同首长打交道，但

我也不敢明说江青看不上我。戚本禹说：这样吧！以后由我同小组领导联系，你们有重要情况汇报请示先同我讲，我到会上说。后来，戚本禹又对我说，以后办事组的事由他来管。戚本禹主管办事组，对我是一种解脱。

我又无端挨批评

此后，我更加小心谨慎，尽量不见江青的面，怕她看到我惹她生气。有时小组在大客厅开会，需要向小组领导送文件的事，我都让矫玉山或李奎林去送。我只愿意做点默默无闻的实际工作。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不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打交道是不可能的，除江青外，其他小组领导和小组成员，关注的是工作，同工作人员接触还是平等的，而唯独江青那么在乎工作人员的外在形象。

1967年的夏天，一个上午，有一次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会场集合了十几万人，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文革小组不到会，他们就不开会，也不散会。大会指挥部，连续几次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电话，催促小组成员快去参加会，那时已经10点多钟，学生已坐等两个小时了。

王力来到办事组后，我向他汇报学生等小组成员参加会的情况。王力也有些着急，他对我说：“你亲自去请示江青同志，叫她定谁去参加会。学生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不去不好。”王力又强调：“你是办事组长，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就去向江青同志请示，其他同志都不能定。”

我有苦难言，就怕同江青见面，而王力逼我去找江青，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江青，心想尽量把话说得明确简短些，以免影响首长。我马上去十一楼，先找到江青警卫员孙占龙，请他向首长报告，说有要事请示。孙占龙进江青的办公室看了一下，回来告诉我首长刚起床。叫我在会客厅等一下。我坐在客厅沙发上大约等了十多分钟，孙占龙告诉我首长来了。我站起来向江青汇报，红卫兵在体育场开会等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由于我过分紧张，说话的声音可能都变调了。江青突然大发雷霆，说：“你看你这副样子！我看你这个样子身上都起鸡皮疙瘩。阎长贵也有这个毛病，这都是个人主义作祟……”

正在江青大吵大嚷的关头，戚本禹进来了。江青又冲戚本禹发火：“戚本

禹，你以后不准往我这里带生人。你知道我怕见生人嘛，今后办事组有事你直接同我联系，不要叫外人来。”戚本禹向江青劝解说：“好！以后我同你直接联系就是了。”这时炊事员来给江青送早餐，戚本禹趁机对我说：“你回去吧！我同江青同志商量去参加会的事。”

我灰溜溜地退出了江青的会客室。回办事组值班室我向矫玉山和李奎林述说了我去请示江青的遭遇，并转告他俩以后不要直接去找江青，只能通过戚本禹去请示她。王力叫我去找江青请示工作，我有何辜，无端受了一通批评。

我同江青打交道中唯一没挨批的一次

在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两派斗争中，江青、陈伯达是支持聂元梓的。聂元梓得到江青的青睐，享受着特殊的待遇，譬如聂元梓想到钓鱼台来就来，开始在多数情况下她都受到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接待。1967年4、5月，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会开完会后，已经是12点以后了，江青仍在十六楼大客厅单独同聂元梓密谈。大约凌晨两点钟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到值班室通知我说：“江青同志让你去大客厅有事！”我立即到大客厅见江青，看到江青和聂元梓还在谈什么，当我站在江青面前时，江青抬起头打量我一下说：“你马上去北大，取一件东西，快去快来，我们在这里等你拿回来，你要亲自去！”这时，聂元梓接茬说：“你到北大××斋×号，去找一位叫×××的女同志，叫她把我设计的一张复课闹革命的图取来。”因为那位女同志不认识我，我让聂元梓写个便条，聂元梓写好便条后说，“你就说我要那个图，一说她就知道了。”

我遵命立即赴北大，找到那位女同志，取回了一张图，回钓鱼台交给了江青。由于是夜间行车，交通顺畅，我又一点不敢耽搁，来回不到半小时。当北大的那位女同志交给我一张十六开纸的图时，我翻看了一眼，只不过是一张写有各系的名称和复课时间的图表，完全可以向江青口头汇报，可聂元梓故弄玄虚，骗江青，好像珍藏了贵重的“联络图”。这是我同江青打交道中，唯一没挨批的一次。

中央文革开会不作会议记录

中央文革小组的会，到 1967 年后，周恩来总理是固定要参加的，后来亲自主持会。当时中央常委中能代表党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只有周恩来一人，他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后来通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小组会上作了决定，需要发文件的都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这四家的名义发出。可见中央文革已经变成了政治实体。可是，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从来不让作记录，这样的决策机构在会上每个人的发言和做出决议都没有记载。以往文件绝大多数是王力根据会议的议论和决定凭记忆起草，然后送周总理、陈伯达、江青等人批发。这种状况的形成和陈伯达、江青的政治需要有关，陈伯达、江青在会上往往是信口开河，说话毫无准头，如果给他们记录在案，以后出了错，他们就无法赖账，不记录，他们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出了错，一推六二五，空口无凭，抓不着他们的辫子。因此，江青、陈伯达都是“一贯正确”的。

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不作记录这种不正常状况，周恩来早就感觉到了，他主持碰头会后，提出碰头会要作记录。有一天，周总理来到办事组值班室对矫玉山等人说，今后碰头会要作记录，记录人由总理值班室出一人，办事组出一人，两人参加会议作记录。第一次由总理值班室的周家鼎和办事组的矫玉山二人参加了碰头会作记录，不知何故，江青竟然没有反应，他俩平安无事地完成了首次记录任务。由于周总理布置碰头会要作记录那天我不在值班室，矫玉山向我传达了以后碰头会要作记录的指示，要我第二天去会上作记录。

为了慎重，开会前，我报告戚本禹，周总理让办事组和总理值班室到会上作记录。戚本禹不假思索地说：“那你就去吧！”

说也巧，那天晚上碰头会前周总理去毛主席那里谈事情，总理值班秘书还没来钓鱼台，我怕耽误事，就提前准备好纸笔先到了会场，坐在会议桌后边沙发上准备伏在茶几上作记录。这时参加碰头会的人已经到齐，专等总理来开会。不一会儿，周总理匆匆赶到会场，他坐定后刚说了两句话，“我去主席那里，主席讲，兰州军区的×××过去历史上是有过战功的……”

这时，江青突然发现我在做记录，她打断了周总理的讲话，阴阳怪气地说：“我们这个会需要作记录吗？”然后看着我问：“是谁叫你来的？”还没等我回答，列席会议的叶群赶快声明：“不是我叫来的！”

会场鸭雀无声，气氛异常紧张。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总理说话了：“是这样的，我说过碰头会上要记录的，不过今天这个会的内容可以不做记录！”我趁机退出了会场。

上边几件事，是我同江青直接打交道时所遇到的难堪。江青看不上我这倒是小事，但她这种蛮横无理的霸道作风实在令正常人难以容忍。而我这个忠顺的“驯服工具”都忍耐下来了。

江青指示清华大学造反派污辱性批斗王光美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在清华园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和彭真、陆定一、薄一波等人的大会。当王光美被押着出场时，她套着紧箍着身子的旗袍，头顶戴着一顶洋草帽，脖颈挂着一串乒乓球制作的“项链”，这身打扮很不合时宜，当时还是春天，却身着夏装。显然，这是对王光美的丑化和污辱。

这个丑化和污辱王光美的穿戴是江青亲手制造的。笔者作为见证人，把这场对王光美人身丑化和污辱的内幕告诉国人。

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于1963年夏天第一次陪同国家主席刘少奇访问东南亚几国，这作为国家外事活动，是很正常的。出国要路过上海，行前在一次舞会上，王光美见到毛主席，问他给在上海的江青带不带信。毛主席托她给江青带去一封信。在上海江青几次约见王光美，除了谈文艺界的这种或那种情况外，还就她出国着装提出建议。王光美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出国访问时还是按自己的意愿和国际礼仪变换服装。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此，江青是十分不满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呼风唤雨，对她过去的“仇人”或不满的人一一实行报复，王光美的遭遇就是江青报复的一例。

1967年4月初，我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对清华大学策划批斗王光美等人的大会，事前毫无所知。就在这个会召开前两、三天的一个深夜，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刚刚开完，江青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叫到钓鱼台十一楼她的住处。不一会儿王力和关锋回到十六楼办事组住地，他们把我叫到小会议室，向我布置一项紧急任务，并要我立即执行——而这时已经是午夜了。

关锋向我交代说：听说，最近几天，清华要召开批斗王光美的大会，清华的造反派学生要在批斗会上给王光美戴什么木制的一串项链，这样不太好，要讲政策嘛！你现在马上去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总部传达我们的意见：王光美前几年出国访问时，不是穿着漂亮服装吗？为什么不可以叫她穿上出国时穿的旗袍，戴上草帽和珍珠项链参加批斗会呢？这正好还她以本来面貌！你去传达这个意见，尽量说服他们不要戴木头制的项链，叫王光美穿上出国时的那套行头参加批斗会。关锋强调：跟他们传达这个意见时，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我们只是给他们提出建议，叫他们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关锋接着说：这件事不能叫蒯大富来办，他不大听招呼，办事也不牢靠。他转脸对王力说，清华大学井冈山勤务组的潘某某，这个女青年很注意掌握政策。办事又认真负责，通过她向井冈山总部提出来比较好。王力点头。关锋对我说，你马上去清华找小潘，这件事要注意保密。

关锋急如星火，叫我马上去清华，这时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我只能照办，立即要车去了清华。深夜的清华大学校园一片寂静，空无一人，学生都在宿舍熟睡，去哪儿找小潘？我又不知道宿舍在何处？为难时正好发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屋子，找到几个学生，让他们把我带到井冈山总部办公室，又由办公室值班的同学到女生宿舍找来了小潘，我告诉她有紧急事对她讲。小潘把我带到另一个小办公室，我原原本本地向她传达了关锋的话，但我没说关锋的名字，当时也没有别人在场。小潘认识我，知道我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她一再向我解释：我们总部并没有主张给王光美戴木制的项链，我们是把乒乓球串起来做成的“项链”，这并不重，不会伤着她。我再三叮嘱她，向总部勤务组提出让王光美穿出国服装问题，千万不要说这是中央文革的意见，就以她个人的名义提出。小潘表示一定照办，并答应保密。

第二天上午，小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井冈山兵团总部同意了她的提议，但王光美的衣服在她家里，怎么才能取出来呢？我去问关锋，关锋说，王光美家里的东西需要周总理批准才能取，他让小潘直接去请示周总理。

就在当天晚上，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开会，接见某省两派代表。会前，周总理和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经先到，在安徽厅旁边的休息室等候开会。事先我与小潘约好，叫她当晚到人民大会堂找周总理

。小潘按时到后，我叫办事组会务组的周占凯把小潘带到休息室。

小潘到休息室找到周总理，提出要在清华大学开的批斗会上给王光美穿出国的服装和配饰，当然也说了几条理由，如群众的要求，不算武斗，“还她本来面貌”之类。周总理开始时不赞成这么做，认为用这种方式让她参加批斗会不好。小潘一再申明这是群众的“要求”，坚持要给王光美穿出国的衣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要求”，周总理无奈，只好同意让小潘等人去王光美家取她出国穿的衣服和行头。周总理最后说：“你们一定要坚持给她穿，能给她穿上就穿吧！”

江青的这一手十分阴险，把她的报复行动经过周总理同意合法化了。江青对她自己的小儿科把戏很得意，开批斗会那天一大早，她的女儿肖力（李讷）就出现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江青还指使新闻电影制片厂派人去现场拍摄批斗王光美等人的新闻记录片。同时，在批斗会那天江青还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看。我们办事组只好派车把她的警卫员、护士和服务员等四、五个人送到清华去看热闹。我随着江青工作人员一起去了清华，也想看看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落实的情况。当我们到达清华时，批斗大会已经开始，30多万人的会场我们这些人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后边的空场看了一会。果然王光美出场时两个红卫兵扭着王光美的双臂，穿着紧身的旗袍，戴着洋草帽，挂着乒乓球制作的“项链”，并强迫她做“喷气式”接受群众批斗。

关锋叫我找小潘传达这个“主意”时，没有提到江青，只强调说：“不要说这是谁的意见。”但我推测这是江青的主意，大概不会错，理由是：

一、王力、关锋是从江青那里回来后马上向我交代任务的，而且急如星火，不能隔夜，要连夜办妥。

二、据我的观察和了解，以王力、关锋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地位，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干这种事，因为这是对国家主席夫人采取丑化和污辱行动；如果顶头上司江青或陈伯达有不同意见他们承担不了；别说王力、关锋，就是陈伯达当时也不敢独自出这个主意。不言而喻，王力、关锋是奉命传达江青的黑指示。

三、肖力在批斗会召开那天一大早就去了清华，这时她已经从中央文革办事组调回解放军报社工作了，她去清华显然是领受了她妈妈江青的旨意。

四、江青指示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去清华大学看批斗王光美的热闹，这不正反映着她的阴暗心理吗？

五、江青没去参加批斗会，可就在当天晚上迫不及待地在钓鱼台十七楼放映厅看了批斗会的现场记录片。

基于以上几个理由，我断定丑化和污辱王光美的阴谋出自江青。最近看到王光美的访谈录等书籍和文章里也谈到这件事的历史背景：1963年夏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前，曾在上海见江青时谈到了出国着装问题，王光美没有采纳江青的意见，这就种下了江青怀恨王光美的种子，江青得势后就进行报复。

还有一个旁证，这就是1967年给江青担任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在关锋生前，曾就这件事问过关锋。阎长贵问：“批斗王光美时给她穿上出国服装是不是江青的主意？”关锋不好意思而又含糊糊地说：“可能吧！”关锋虽然闪烁其辞，隐去了他布置的环节，但他实际上承认了这件事是江青的主意。

这里顺便说一下，同我一样，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员小潘是这件事情的执行人。小潘当时仅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学生，文革开始时，曾和蒯大富等一起造过工作组的反，后来被选为勤务组成员。小潘多次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在会上的发言很“得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特别是关锋很欣赏她，认为她讲道理，处理问题踏实，关锋之所以把这件事交给小潘去办，而不交给蒯大富，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小潘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勤务组会上就是以她个人名义提出给王光美穿出国服装的，一直没有透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授意，甚至连蒯大富也蒙在鼓里——据说，不久前蒯大富还认为这是小潘的主意。在这件事情上小潘没有什么责任，她不过和我一样是那个疯狂、邪恶年代的受蒙蔽者而已。

【江青研究】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

阎长贵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成立的一个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体制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

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题目谈谈这个问题。

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这为走上政治舞台协助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江青提供了呼风唤雨的平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是副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执牛耳者是江青。陈伯达是傀儡，是“刘盆子”。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独裁”和“专政”，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当年的红卫兵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陈伯达和其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作为当事人，也都这样或那样地谈过这个事情。

陈伯达回忆说：“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横行跋扈”，“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意为‘算数’——引者）”，“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页）

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陈伯达是常委、文革小组组长，地位很重要，但在常委会上陈伯达就讲：‘我不过是刘盆子。’”（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712）穆欣对陈伯达自称“刘盆子”做了明确的解释：“陈伯达之所以这样讲，无非是让人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江青当家，他这个组长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259页）

关于江青控制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文革小组实行“专政”，穆欣还有更全面、更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是江青眼中的“刘盆子”，是其他成员心目中的傀儡。凡事他都得看江青的眼色行事……江青这个女人，她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假传“圣旨”。…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就得耐着性子等候；开会时，经常由江青包场，“哇啦哇啦”地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了分歧，江青就叫大家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原地“休息”，直等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江青

心胸狭窄，喜怒无常。得意时，胡侃神聊，一不如意，怫然大怒。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她讲话发言时，不怕别人震耳欲聋，可是，她却不许别人出大声……在小组里江青俨然就是凌驾全组之上的“女皇”。（见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第 368-369 页）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确确实实是江青说了算，“一言九鼎”。我们工作人员也看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指示可执行可不执行，而对江青的话和指示那可是说一不二，一点折扣都不能打，一句话，江青对小组成员颐指气使，小组成员对江青毕恭毕敬。

1966 年 8 月，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 8 月 30 日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这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根据，更名正言顺。

江青对陈伯达很不客气，疾言厉色，经常像训小孩那样训他。陶铸在文革中曾对他夫人曾志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见《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54 页）如果说江青对陶铸都这样，那她对陈伯达就更是这样。兹举几例。

王力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1967 年 1 月 4 日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对此，毛泽东 1 月 8 日肯定，到 2 月 10 日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他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吓得陈伯达要自杀，他说：“江青逼得我活不下去了。”他还说，那一天——指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 1967 年 1 月 4 日，我都吃了安眠药了，是江青硬拉着我去的。康生也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康生在王力、关锋“顾全大局”的劝说下主持开会，江青借口身体不好不参加，会议只批评了陈伯达，没有一个人批评江青，而对陈伯达的批评也是轻描淡写——因为陈伯达都要自杀了，谁也不好再说很硬的话。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参见《王力反思录》第 976-977 页）

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事。一次，在十一楼（江青住的楼）的会议室，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劈头盖脸地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唉……”，长叹一声。“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过，我倒觉得，江青这个尖刻、辛辣的数落，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的一个致命弱点——推脱责任。

我还碰到一件事情，就是1967年1月的一天，我到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值班室去，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江青对着陈伯达说：“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听到江青这样说，我心头一震，赶忙退了出来，我不知道江青为什么对陈伯达用“熊样”这样不雅又伤人自尊的语言。后来知道是这么回事：1967年1月19日，陈伯达和江青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陈伯达说：“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他们的讲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去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毛泽东说肖华还要保，陈伯达吓坏了。江青这次教训他，是给他打气、鼓劲。

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这样，也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最突出的，就是我看到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尊重。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的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冷嘲热讽地说他接受陶铸的礼物；陈伯达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听到陈伯达向戚本禹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个含义：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主席、江青的关系好；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戚本禹不要在毛主席、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关于陈伯达收受陶铸礼物的事，后来我问了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他们说，是陈伯达托陶铸从香港买的一个收音机，根本不是陶铸送的什么礼物。

谈到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也当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宴的态度。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宴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什么理论性强啊，水平高啊，等等。我说：“叔宴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我当然要告诉江青，要替她问一问。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是走回来的，同平常散步一样，江青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当她坐在椅子上休息时，我向她报告了刘叔宴请她给安排工作的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她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刘叔宴传递什么信息，但我感到没法交代——因为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宴……

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事和怪事，这就是开会不做记录。为什么？江青不让记。开会不让做记录，这也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表现之一。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开会她从不让记录。避免留下任何痕迹。”又说：“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作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她认为，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咒天骂地，就可以大搞阴谋诡计，谁也不会记录本上留下她的罪恶言行。后来，周恩来经常主持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他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平安无事’，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在第二次，当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一见，立刻神经过敏，怪腔怪调地责问：‘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周恩来回答说：‘是我叫来的！’转身又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尽管是总理的决定，也遭到了江青粗暴的践踏。”（见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第280、385页）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一书中反复说“小阎”（即指我）做文革小组会的记录。如第 220 页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江青办公室召开紧急碰头会，“由小阎做记录”。第 234 页说：“陈伯达抬头望望正在紧张地做记录的小阎。”第 305 页说：“好多中央文革小组会”，小阎“都做记录”。这纯粹是胡编乱造。我从来没参加过中央文革小组的会，当然也没做过记录。林青山一点也不了解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的实际情况。

江青为了能顺利地中央文革小组作威作福，实行“专政”，她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办公室（1966 年底，她指示改称“办事组”），很“关心”，很在意，以便这个办事机构能很好地为她服务。这是一个拥有近 200 人的机构，其成员都是按照那个年代崇尚的德才标准，从一些中央单位，特别是军队，选拔来的。现在一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就是那日益减少其人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而到 1968 年 1 月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倒台（实则被相继抛出）后，只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大人物（一个顾问、三个正副组长、一个组员），其他成员绝大多数都被剔除了（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参加的成员，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 14 人，其中：顾问 2 人，正副组长 5 人，组员 7 人）。

应该说，谈中央文革小组光看到他们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说，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忽略掉不妥当。这个办事机构的前两任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轶欧，江青不满意曹轶欧，就以照顾她年纪大的名义拿掉了；第二任是王力。第三任是宋琼，他原是《解放军报》记者部的主任，李讷（江青和毛泽东的女儿）1967 年 1 月中旬在《解放军报》造反，把宋琼揪回去了；第四任是王广宇，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干部，随着王力、关锋在 1967 年 8 月底被抛出，他被退回马列研究院，翌年 3 月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第五任是我，副的是矫玉山，我们时间很短，1967 年 12 月上任，到 1968 年 1 月，大概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都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差不多与我们同时被诬陷入狱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党总支书记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他们都是军队的基层干部；接替我的是李讷，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也是唯一“稳坐钓鱼台”、善始善终的一任。

当我被任命为办事机构负责人的时候，还是江青的秘书。她为什么要我当办事机构的负责人？就是因为她当时还信任我，其目的是要我帮她或替她控制办事机构。我因“莫须有”的“坐探”罪名投进监狱后，江青又叫她女儿接这个位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她要她信任的人控制这个办事机构的良苦用心。她的目的达到了。李讷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负责人，——按照陈伯达的说法：“除了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外，她的女儿当了文革秘书，事实上一度是第二首长。”（《陈伯达遗稿》第 109 页）

江青不仅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斗争，清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剩下他们五个大人物。其情况比较复杂，我不妄加评议。而她把十几个（我这里没把名字都列出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的一般工作人员投进监狱，关押多年，没有一个不是错的，没有一个不是冤案！这也是她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业绩”……

【书评与序跋】

按：本期选发了《周伦佑文革诗选》（此书将自费印行）的两篇序和四首诗，意在向读者介绍当年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对这种文化生态，如今不少过来人已经淡忘，更多的人则毫无所知。

青春琴弦上的叛逆声音

——《周伦佑文革诗选》序言

周伦佑

中国大西南腹地的高山峡谷里，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西昌。激情飞扬的 80 年代，从这里走出三位享有全国知名度的诗人：周伦佑、叶延滨、吉地马加。

同一个地方走出的三位诗人，人生道路和写作方向却截然不同：周伦佑属于体制外诗人，叶延滨和吉地马加属于体制内诗人；周伦佑的诗歌写作从 1969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叶延滨的诗歌写作主要在 80 年代前期，吉地马加的诗歌写作主要在 80 年代中期；周伦佑至今依然为一介平民，叶延滨当上了官办的《诗刊》主编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地马加当上了官办的《民族文学》主编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写作方向属于个人选择，只要经受得住历史审视便无可非议。然而，时间流转和人心评判终会叩问到诗歌的真义。

诗歌是什么？是自由心灵的象征。遗憾的是在这个被奴性群体主义塑造着普遍依附性人格的国度，诗歌的翅膀一直飞不高。具体原因，除了专制意识形态的笼罩，便是诗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精神异化：从自由代言人变成了权势牧羊犬或庸众应声虫。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80 年代争论过，但很快被专制主义所放逐，至今很少有人重新关注。其实现状，异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的基本精神状态。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将精神本质政治化——放弃人性的普遍要求和基本原则，习惯按照统治权力的号召去思去想去看去说；二是将精神本质社会化——放弃个人的特殊感受和独立判断，喜欢追随社会潮流的喧嚣去歌去唱去舞蹈。如果说这两种异化对于常人只属不幸，那么对于诗人就属可悲了。

别以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划分毫无意义，人类历史上诗歌从来就是体制外的。除了极权主义国家，谁见过诗人和作家被集体纳入政权组织系统并按照统治需要进行创作的先例？体制外写作——本来就是诗人和作家的正常向度。

呈现在眼前的这些三十多年前的诗篇，见证了周伦佑在写作起点上对于人生道路和写作方向的最初选择。

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政治专制和思想控制登峰造极，黑铁性质的窒息状态和恐怖气氛吞噬了一切光明，甚至深入到人们提心吊胆的梦境之中。然而只要拥有精神自我和自明意识，人就不可能不产生人性追求和个性应激。事实上巨大的苦闷和迷茫，同时在年轻一代的意识空间催生着不屈的思索与探索。

大西南腹地这座小城的年轻人也不例外。当时，文革中的民众造反运动已经结束，我和伦佑身边聚集了一批热情洋溢和不甘沉沦的青年朋友。按关系深浅分三个圈子：第一属感情性质者，第二属感情+文学性质者，第三属感情+文

学+政治性质者。关系最深的自然要数风险与神圣并存的第三种朋友，前前后后有二十来人。大伙时常三五成群，或高歌于大街、或交谈于家中、或行访于农村、或议论于郊野，谈理想谈抱负谈国家谈个人谈文学谈爱情……尽管话题宽泛而盲目，探索人生出路和确立一生志向的主题却依稀可见。1968年至1976年，发生过许多深入黑暗探索光明的感人故事，有些至今依然不能公开。

记得1969年11月的一天深夜，我正在距离西昌城五十多里的安宁河边周家村小学女朋友R家围炉聊天，伦佑和另外两个朋友开着一辆卡车忽然到来。他们说成都来了两位有志青年，需要连夜接我回城参加第二天的座谈。第二天在下乡插队的朋友D的自留地边，六个头顶蓝天的小青年纵谈古今指点江山，甚至商议成立名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或者“鲁迅研究会”的秘密组织。仅仅因为两位成都青年胆怯退缩，这把自焚的青春火焰没能燃烧起来。

那时的伦佑身材瘦削，表情文静而含蓄，在朋友们面前很少慷慨激昂，总是倾听多于言说，自身的光辉也许被我的身影遮住了。现在想来，当时的他其实是所有朋友中读书最多也最深入、思考问题最宽也最明确的一个。为了寻找生命的照明，我也读书而且读了很多，可是狂躁的心态和外倾的热情使我难以深入，对于文学名著和伟人传记之外的读物往往浅尝辄止而一知半解。文革时期家里的上千册古今中外名著，不仅是他一人寻来并小心保存，而且他认真阅读过的数量也超出我许多倍。其他朋友的阅读和思考更为逊色，大多只求从兄弟二人身上寻找精神依傍和激情感染。那时的我虽然受到朋友们的推崇，其实思想和知识异常贫乏，全靠一股狂劲和傲气撑持着。三年后的1975年，两位追求自由精神的美丽女医生走进兄弟二人的生活，都还感觉周伦佑内心感受更深切文学色彩更浓郁，周伦佑的亮色主要是关注社会问题的热烈表现和阳刚气质。

伦佑的第一次独立发展，大概发生在1969年4月他从地革委广播站自愿招工到西昌县制药厂工作之后。那个地点现在已经成为闹市区，当时却孤零零地处在小城西南郊的公路边上。我家原来居住在小城西面的石塔街，房屋是1965年母亲花一百七十元钱购得并由伦佑辛苦维修出来的，后来毁于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的炮弹。1970年至1978年，一家六口只得租住在小城东北角玉壁巷妥姓人家不足二十平方而且破旧不堪的小阁楼上。伦佑每天上班去工厂和下班回家

，都要在小城东北角和西南郊之间对穿全城两次。那时的他开始戴眼镜了，穿着简朴的青年装或战士服，每天出门前都要把头发梳理整齐，手里自然忘不了拿上一本厚厚的读物。瘦削的身影走在街上，显得非常特异。本来我自认为已经像个文人，可是家里两个小弟弟反而经常开玩笑称他“小文人”，这使一生喜欢读书人的母亲感到十分惬意。1964年冬季他就喜欢上音乐，不仅会吹笛子会拉二胡，而且学会了作曲。自从1968年他有了一把小提琴，便长期相伴。有时夜里不回家，他便站在工厂宿舍楼小小房间的窗户边，用琴声诉说内心的苦闷与追求。1969年他已开始悄悄写诗，但很少让人知道，也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

其实1964年秋天至1972年秋天这段时间，无论对家里的贡献还是对我的感情，他的付出都比我多出许多。1969年5月，我被流弹击中头部躺在医院里昏迷了十多天，他为了抢救我的生命，不惜将300CC鲜血输入我的体内。我却为了寻找个人出路，一直奔跑于青春期的唯我主义单行道，不仅把家庭重担全然抛给他，而且对他的存在和成长也很少关注。我对他的影响，主要是某种反叛姿势和反思氛围，而非诗歌写作。

我的关注和震惊，发生在他已经写诗两年多的1972年深秋。1971-1972年，我在这座城市军人政权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坐了两年监狱。在我带着第一次思想发现的惊喜无罪释放回家的当日，兄弟二人同床而眠，一直倾谈到天亮。点着小油灯，我们之间有着谈不完的话题：从人生志向到奋斗目标，从多病的母亲到幼小的弟弟，从两年来的经历到过去比较回避的爱情事件……我给他介绍自己这两年的思想发现：马克思主义早已演变成了民族主义的理论武器，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是国家形式的资本主义；我告诉他要用毕生精力写一本名为《世界整体观念》的著作，彻底破解社会主义之谜。他给我看这两年思念狱中的我而写的旧体诗，笔记本上渗透着斑斑泪痕；他让我阅读这两年创作的自由体诗篇，那直指人心和专制现实的艺术力量令我震撼。我忽然发现他不再是过去那个被我遮盖着的三弟，整个人已经焕然一新。从情感到精神，青春期的个性隔膜荡然无存，我们真正成了最亲近、最理解、最平等的兄弟和朋友。

1964年秋季年我就开始写作了，文革前还在《西昌群众报》和《新农民报》上发表过不少作品。文革中更写了许多东西，有诗歌、歌词、小说、散文、电

影剧本。可是和伦佑的作品相比，我除了诗歌《夜幕下的金沙江》、歌词《孤雁之歌》、散文《新青春的沉寂》、小说《无常旅途》比较真实，其他文字都带有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的深深烙印。比如我写了一个反映真人真事真感受的中篇小说《旧青春的祭祀》，也不得不把社会背景放在国民党时代。那个时期，我的叛逆全部在隐秘地带进行，凡是公开行为都显得比较正统。虽属对于政治迫害的预防策略，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习惯。这与1990年代以来国内自由主义者的分裂形象比较相似，只不过我的分裂发生在三十多年前。难怪当时西昌城里另一伙思想更为激进的青年，比较喜欢和伦佑接触而与我保持相当距离。照他们的说法：周伦佑更激进更实在，周伦佑太正统太清高。

一个朝代或一个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威力无比，它把具有合法性、功利性、通约性而显出普遍效应和巨大诱惑的话语之网罩向每一个人，让人们无形中接受它所规范思考方式、想象方式、表达方式，逐渐形成日常习惯而被异化。文革时期苦苦寻找国家和个人出路的青年，照样避免不了这种异化情形。这个时候，比我们大几岁的叶延滨正约着女友去延安下乡插队，打算创作一部像柳青《创业史》一样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作品；北京的地下诗人食指正进入创作高峰期，作品中充满相信党和社会主义的正统情怀。我和伦佑有一个写诗的朋友X，四川林学院学生，真正称得上英俊潇洒、气宇轩昂、才华横溢。然而他那些洋洋洒洒的诗作，总是跳不出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的俗套。比如在其比较真实的个人抒怀诗中有一个“碎石”意象：1978年以前，他只会把自己比喻成一颗为祖国建设垫路的石子，甘愿让时代列车从自己身上碾过；1978年以后，他最多感觉自己这颗垫路石子是块宝石，希望修路者发现自己的非凡价值。那时我的所谓写作，同样在滑向正统意识形态的轨道，再走几步就会跌入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的泥潭。我之所以在1975年夏天，为了应对全城大搜查而决意烧掉它们，也是感到保留下来并无多大价值。幸好伦佑的诗稿被他从熊熊火焰中抢救出来了。

虽然自己的写作充满伪饰，但我并未丧失对于文学作品的正常判断。伦佑的这些诗篇，不仅反映了小城青年苦闷、彷徨、探索、反叛的精神历程，也让我一眼就看出什么是真正的写作。其中那些人性化和个人化的闪亮品质，与奴性文人们的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形成鲜明对比：**回到一个人真实的需求、感**

受、判断；回到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勇气、胆量、承担；回到一首诗纯正的构思、想象、语言。这一切我没有做到他却做到了，我感到一个真正的诗人已经出现。当时的感动、欣喜、敬重……可想而知。记得我有个毕业于四川大学的朋友 H 读了伦佑这些诗稿后，激动地说西昌诞生了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甚至几年后的一天我还抑制不住地对家里最小的五弟说：你的三哥必将成为一位大诗人！

当然，不能认为他 1969 年到 1982 年这个时期的写作，不曾有过暂时晕眩造成的方向闪失。至少 1950 年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纯粹。即使思想解放的 80 年代所谓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甚至“朦胧诗歌”，也都还在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的氛围里扑腾，谁能全然避免正统意识形态的笼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敢于正视并制止自己的变调，及时回到青春琴弦上的叛逆主题。

对于我们兄弟二人，1972 年仿佛是个特殊的年份。我在监狱中苦读和苦思一年之后，终于迎来思想闪电忽然撕开重重疑云的第一次顿悟收获，从此确立了一生的哲学志向和写作目标，我此后的思考和写作一直在这条道路上行进；伦佑的诗歌写作也在这一年奠定全部起点，并朝未来道路射出方向性的光芒，他在青春琴弦上奏响的叛逆声音一直延续在三十多年来的诗篇中。曾经有一个感悟：有些人小时候的特长往往预示着一生的事业方向。我六岁时就对死亡现象特别敏感，那时所下的定义至今仍未失效。伦佑八岁就会写诗，诗作经常被老师拿到课堂上朗读。1972 年兄弟二人，一个正式走向哲学，一个正式走向诗歌，都找到了最佳的事业依托。

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伦佑的最初诗稿仍然闪耀着人性化和艺术化的强烈光辉。不被时间磨损和人心疏离的品质，自然来自诗人的写作三十多年前就突破了政治异化和社会异化的双重包围。那些豢养在官方组织围栏或意识形态围栏中的诗人，他们三十多年前的作品没有一首留得下来。两相对比中的价值追问，可给今日的写作者一个响亮的历史启示。

不灭的人性将使真正的诗篇不朽。

2008 年 8 月 12 日

写于古邛都森林居

(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书评与序跋】

破镜中成长的诗歌青春

——《周伦佑文革诗选》自序

周伦佑

这些诗选自我文革时期的两部诗集，写作时间是1969~1976年，最早只给少数朋友看过。这些文化专制时期严格意义上的挚友和秘密读者是我哥哥周伦佑，我那时的几个朋友王宁（原西昌印校学生，现就职于西昌人民印刷厂）、黄果天（原西昌川兴公社知青，现为成都地质学院讲师）、王世刚（原西昌大营农场知青，现调成都某文化馆）、欧阳黎海（原西昌大营农场知青，82年自杀）、刘建森（原西昌大营农场知青，现任西昌农专图书馆长）、白康宁（现任职于西昌农专农学系）、林渝生（现任职于西昌师专图书馆），以及六十年代就已发表作品的那时西昌唯一的诗人，现任《凉山文艺》诗歌编辑的胥兴和。以后亚琴成为这些诗的主要读者和保存者。这些诗当时只能在朋友中秘密阅读，是因为那个年代残酷得令人窒息的现实：经常抄家，文字狱，甚至说错一句话呼错一句口号也要坐牢判刑。我那时在一家制药厂当锅炉工，业余时间除读书、学音乐外，还喜欢玩蟋蟀。一次单位组织看“革命样板戏”，我随口说了一句“样板戏还不如斗蟋蟀好看”，就被我的师傅检举揭发而由单位报准“厂内点名批判”。这些诗如被查出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如胥兴和当时读了这些诗后说的：“这些诗被查出来是要掉脑袋的呀！”

在我写作这些诗的同时，西昌、攀枝花（那时还叫渡口）一带的知青中也有人写诗，其中流传比较广的有两首，一首叫《知妹》，四言四句：

嫩白脸蛋/肩披长辫/行走如飞/快马加鞭

节奏明快，典型的夸张手法，又略带点滑稽。另一首是仿毛泽东十六字令格式的《苦》，全文如下：

苦。清水萝卜乳豆腐。时间迫，三餐一顿煮。

苦。无菜去跳丰收舞。偷只鸡，闭门悄悄煮。

苦。屋角找遍烟屁股。得翻身，牡丹当粪土。

这后一首诗比较真实、凝练地再现了知青生活的一些细节，而且便于记诵，所以口头流传较广。和我那些在知青中传抄的诗一样，这两首诗也没有作者，这是当时知青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还有知青的习惯用语，如四川知青把晚上出去偷菜叫做“跳丰收舞”等等，“牡丹”则是文革前的一种高级香烟名。

和这些口头流传的知青诗相比，我那时的诗更深地触及了一代人内心的苦闷，对现实的迷惘、绝望，以及对未来的渺茫希望；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对构成我们身心交困的那个制度的思考和怀疑，这在当时的知青文学中是很少有的。如我们后来知道的，那时的知青文学一般都是在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感情基础上抒写个人（或一代人）的苦闷与哀乐的（如食指那时的诗，可参见《诗探索》1994年第二期食指回忆文章），或者局限于在体制内部区分“好人”与“坏人”，寄希望于为民请命的“好领导人”（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最精英的思考也主要是将当时的中国现实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照比较，而后得出：“文革时期的中国现实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突破这种“局限”无异于用生命探雷——因为那个年代任何与制度相抵触的思想和言论都是要被处以极刑的。

尽管有这种种限制和禁忌，这些诗还是在少数朋友的阅读中被传抄出去了，并在川西南——西昌、攀枝花一带知青中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最后又传抄到我手里。由于前面谈到的那些原因，这些诗编成集时我没有署真名，只用了化名，还画蛇添足地在诗集的“序言”中假托：“这是一位死者的遗稿”，以便东窗事发时有个退路。因此，当这些诗传抄到我手里时，我从来不敢承认是我写的。这种近似于胆小的谨小慎微在今天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看来，肯定是

不可理解的，却是那时我们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自觉的部分：一种在残酷的环境中保全性命的需要，几乎是从遗传中培养起来的本能。我前面提到过，我那时除了热爱文学，还喜欢音乐。一次从文工团一位老师那里借到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总谱，便关起门来练习演奏，当有人问起时，便说演奏的是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选曲，这样才骗过了那些“革命螺丝钉”的耳朵。此事成为朋友中的一段趣谈，前不久还有一位知道此事的老朋友向我谈起。

我那时没有下乡，但所有的朋友都下乡了（我哥哥伦佐也是知青）。我白天在制药厂烧锅炉，每个周末、星期天大都在各个知青点“串队”，被有的朋友善意地取笑为“搞社会调查”。在每个知青点，在那些相识或不相识的知青的日记本上，几乎都抄有我写的诗。发现这一点，首先是甜蜜中略带点苦涩的惊喜，崇高感过去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莫名的恐惧。诗被传抄着，本来也是我内心所希望的，但想到可能由此而带来的灾祸，又惶恐不安。那个时期，街头张贴的布告上打了红×的“反革命犯”中有不少就是因文字而罹难的。那一阵，每次厂里通知我去参加县上召开的“公捕公判大会”，我都要提心掉胆一回，直到会完了，被点名揪上台的人中没有自己，又才松了一口气。那时抓人事先是不通知你的，都是在会场上突然念到名字，然后由周围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积极分子扑上来按住头扭住手推搡着揪上台去。所以每次去开会我都特别紧张，就怕喊到自己的名字，甚至平时有人突然喊我的姓名，我也会吓出一身冷汗！那种因极度的恐惧而“心紧”的感觉直到十多年后再次深入我黑白不分的现实梦境，我才能够最终确认：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创伤，它于我已是根深蒂固不可分的了。

这些诗得以保存下来，中间还经历了一些曲折。

第一次是1972年初秋。一天我哥哥伦佐得到一位熟人的告诫，说当天夜里要全城大搜查，查反动传单和反动日记，要我们当心。伦佐紧张地和我商量对策，我主张找个隐蔽的地方把手稿和日记藏起来，伦佐不同意，说万一查出来要坏大事。我问怎么办，他说烧。我那时一切听伦佐的，便找出手稿和日记放在一个破瓷盆里端到后院去处理。后院已破败，有一棵很大的皂角树，一口浅浅的水井。烧稿之前我又劝伦佐把手稿暂时藏起来，说别人告诉的消息不一定

准确。伦佐犹豫了一下，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烧！”一咬牙点燃了破瓷盆里的日记本和诗稿、小说稿。当火“腾”地燃起来时，我不知哪来的果敢，伸手从火中抢出了我的手抄诗集，一边扑灭上面的火，一边对伦佐说：“这本诗集我留着，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伦佐没有再劝阻我。当天我便把诗集用牛皮纸包好藏在后院老墙的砖缝里而躲过了一场劫难。这次焚毁的计有伦佐的两部中篇小说《旧青春的祭礼》、《新青春的沉默》和长篇电影剧本《梅花宝石》，还有我和他这个时期的几本日记。那个傍晚，后院破瓷盆里跳动的火苗和随后飘飞的文字灰烬，连同那个时期的青春热情，这些年来时常浮现在我的记忆里，使我百感交集。我不知道伦佐是否还想起它，在我是怎么也忘不了的。

第二次是1973年，当时伦佐因写了一篇标题为《疑问》的大字报而被捕入狱，我怕抄家，便把我的所有手稿（包括诗集、小说、电影剧本、随笔等）连同伦佐的哲学手稿一齐存放到西昌马道公社一位女知青处，请她代为保存一段时间。接着，我也因《疑问》一案被隔离审查了。几个月以后，隔离解除，我去那位女知青所在的生产队取回寄存的文稿时，她早已不辞而别，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靠她的亲戚去了。我请她代为保存的文稿她也未向任何人作任何交待（和她同队的知青都和我很熟悉的）。她住的那间草房已改做生产队的牛圈。我怀着阴冷的心情，好不容易才从牛粪和稻草中找出十分之一的文稿，其中包括我抄在两本硬面日记本上的诗和伦佐的几封信，其余大部分文稿已被牛蹄践踏混合在牛粪中而不能还原了。这次，又是这些诗逃脱了劫难。

第三次是1976年，因为担心随时可能的抄查，我和亚琴把我的文稿连同我俩的日记藏在西昌农专图书馆大楼过道的楼梯板下面。图书馆大楼是一幢旧楼房，夜深人静时，我们照着手电，撬开楼梯木板，把文稿和日记放在里面，再把木板钉牢。后来，当我们从楼梯板下面取出这些文稿时，长方形的日记本和诗集已被老鼠精密的牙齿修理成椭圆形了，值得庆幸的是内中的文字没有被损坏。

七十年代的西昌是西南边远山区的一座小县城，街道、市容保留着古朴的风貌，但很闭塞，铁路没有修通以前，从这里到成都要坐三天汽车，到昆明也是。以写《西昌月》而知名的作家高缨是以西昌为他的创作基地的，但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只有我哥哥伦佐和高缨见过两次）。我们那时一群朋友是以伦佐为

中心的，朋友们经常在我们家简陋的阁楼非正式聚会，讨论文学，借、还书，也讨论政治。以后影响了许多人专心文学，钻研理论的文化氛围便是从那时起形成的。由于地处偏僻，交流的空间很小，再加之当时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要读到一本好书是很不容易的。“五四”时期的中国诗人作品我读过《闻一多诗文选集》、《冯至诗文选集》，朱自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还有中共执政后臧克家编选的《中国新诗选》；外国诗人作品我读得较多的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拜伦，更靠近现代一些的有《阿拉贡诗选》、《阿尔贝蒂诗选》、《马雅可夫斯基选集》第一卷以及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译文》杂志译介的波特莱尔的几首诗，现在还记得译者是陈敬容。从我那个时期的诗歌习作中，都可以找到这些诗人影响的痕迹。精神品藻方面对我最具影响的是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他的两句话：“心不存乎矜尚，情不系之所欲”，是被我奉为座右铭的。他的精神风貌，“目送飞鸿，手挥五弦”，弹一曲《广陵散》然后从容赴死的潇洒仪态，是我毕生倾慕的境界。外国文艺理论我读过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是建国前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中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所著《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艺创作论，“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很能贯彻我那时的心情。也是在厨川白村的这本论著中，我第一次知道了柏格森和弗洛伊德（鲁迅译作弗洛特）的名字，在内心更多认同弗洛伊德的观点。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诗在艺术上的不足是明显的：摆不脱的押韵；缺少变化的语言句式；批判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手法。但这就是我那时的真实状态：从人到文体的封闭和压抑，缺少超逸和开阔。想想那个年代的文化专制主义，想想西昌当时的闭塞状态，再看看那个时期其他先驱诗人（黄翔、食指等）的同类作品，我便不再苛求自己了。我把这些诗的原始手稿给成都的几位朋友钟鸣、廖亦武、黎正光等看后，他们建议我选一些刊登出来，既可作为我诗歌创作的早期脉络印证，又可为南方早期诗歌及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研究提供一点具体可感的资料。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我更愿意把这些诗视为那个年代青春残遭压抑的证词。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二十多年时间，经过许多虚假的幻觉之后，我重新与我的诗歌青春相遇，当然心情已大不似从前了。但我愿意把这些早期的脚印带在身边，让它们时常提醒我：不要忘记一个诗人的责任。

1994年9月12日于西昌月亮湖畔

附录

周伦佑文革时期诗四首

冬夜随想

只是寒冷，还不可怕，
因为眼前是亮堂的。
只是黑暗，也不可怕，
因为身上是暖和的。
寒冷和黑夜勾结起来，
却足以扼杀一切生机，
窒息一切希望……
而此时，我只能，
把自己想象成一堆篝火：
——对于寒冷，我是热。
——对于黑暗，我是光。

1972年11月27日于西昌玉碧巷小楼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

寒潮从天外涌来，裹着滚滚浓云。
黑夜撒开大网，收尽了地上的光明。
北风怒号着，奏起尖厉的死亡进行曲。
风尘扑打落叶，撕扯着路上的行人。

啊，白雪皑皑，锁住了群山的锋刃。
啊，严冰层层，封住了江河的涛声。
啊啊，大地在死神脚下微微颤抖，
冬天的脚步正践踏着无辜的生灵……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我们不畏寒冷，
在我们胸中有一颗正直的、火热的心。

在我们胸中有一颗正直的、火热的心，
她每时每刻散发出亿万卡热能。
啊，是祖国母亲赋予我们生命热情，
五千年的血与火呀，一并在我们血管里沸腾。
期待着祖国的召唤，我们熬过了多少时辰。
倾听着历史的足音，我们常从睡梦中惊醒。
虽然，在痛苦的期待中青春已经失去红晕，
虽然命运的鞭子给我们留下了满身伤痕……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为了祖国母亲，
到明朝，我们去向岁月索还失去的青春。

到明朝我们去向岁月索还失去的青春，
在春天的土地上耕耘理想，播种爱情。
今天呀，我们要把一切交还给祖国，
赤裸着全身，剖出心来，高举在头顶。
啊，心在燃烧，心在呼号，逼退残冬的铁阵。
啊，心在呼号，心在燃烧，呼唤祖国的黎明。
也许，心血会滴干，热能会耗尽，
也许，在洒满鲜血的路上春天迟迟不醒……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纵然死去，
在祖国的怀抱里我们将获得永生。

1974年12月28日于西昌制药厂

命运

它把十字架压在父亲背上，
我一生下地，
脸上就带着有罪的烙印。
它用自卑喂养我的童年，
只准我看脚下的草，
我偏要抬起头望天上的云。

它把红字刺在母亲额际，
睁开眼，
耻辱就灼伤了我的心灵。
它用丑恶玷污我的眼睛，
我用泪水冲洗双目——
寻求美，寻求真……

它把重轭套在我的肩头，
使我像牲口，
整日为生计奔命。
它说：磨骨头养肠子——
这就是你的生活，
我在油灯下固执的翻开书本。

我不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虽然它曾一次次前来敲门，
我不接受它给我指定的前途，
我不接受它为我安排的日程。

我绝不作命运的奴隶，我要抗争——
每反抗一次，我就获得一次新生。

1975年1月7日于西昌制药厂

网

在我窗前，蜘蛛张起一面网，
精巧的图案，使我想起古代的织工。
清晨，挂满露珠，像一串串项链，
傍晚，缚住一只只喜爱光亮的小虫。

今天，我早早起来，拉开窗帘，
看见那上面网住了一只蜜蜂。
它挣扎着，发出低微的呻吟，
好像在求救，在呼唤它的友朋。

是被露珠迷惑，忘记了长辈的嘱咐？
是迷失归途——因为那过野的秋风？
我斩断蛛网，把它解救出来，
它跌在地上，又慢慢飞向路边的花丛……

望着它飞去，引起我一阵痛苦的思虑，
我看见：另一只蜘蛛在眼前蠕动……
谁来斩断它——我们身边这无形的网，
救出落网者，像救出这只蜜蜂。

1975年11月30日于西昌马坪坝

【昨日心迹】

重庆武斗见闻日记

(二)

陈懋智 著

陈琳、陈仁德 整理

陈仁德、何蜀 注释

7.25

晨5时十弟起身候肉(注：指到肉店排队买肉)，肉票是找人借的。早饭后去给城里郭道远打电话嘱改买后天船票。下午同去西区公园(注：即重庆市动物园)，晚上又把酒谈天直至午夜。七弟决于明日进城。晚上近处有枪炮声。

7.26

早饭后同七弟、陈杨、陈明(注：陈杨、陈明，陈懋咸子)进城。搭车十分拥挤，到两路口车辆一律停止通行。不久解放军带各种新式武器游行，一致声讨武汉反革命暴乱事件(注：指武汉“七二〇”事件)。约有军车百余部。看了游行更看出我们国家的伟大不可侮。

上午去吴八姑娘处并午饭，郭道远也在家。下午同七弟两孩在市内漫步混时间。晚八时去港务局候船室。在茶馆与七弟谈闲，又看见30年前在武汉的一个相识者何继刚，我未招呼他。

7.27

昨夜在港务局地下睡觉，候船。晨5时上东方红110，预计今日下午二时左右可到忠。我送至趸船码头，给得玖信托七弟带回。

返途中经小十字、杨家坪，都看见有手持武器放哨者。顺便曾去李二哥家

，他们谈了工校（注：重庆工业学校。1967年7月25日两派在该校大规模武斗，动用了枪支，八一五派攻占原由反到底派控制的该校。重庆武斗从此升级为枪战）和泸县一些情形。惠荪（注：李得钊女）准备去忠县。

储儿7月21日来信看后很安心。

十弟拟去成都等地走走，未定。小孩决定送托儿所。

据说九龙坡附近昨夜又有人鸣枪。

7.28

下午忽倾盆大雨。据说中午杨家坪曾放机枪，有卖凉水老人昨天死于弹下。这两天到处都有谣传，胆小的我更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7.29

昨晚入睡较早，在12点后房侧马路忽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从声音中估计约有二、三百人，不知去向何方。楼上还有人起身去看的。我却吓得不得了。又过半小时左右杨家坪（注：杨家坪有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和空气压缩机厂，成为两派武斗争夺的重点，两厂生产的枪支、坦克均被用于武斗）一带传来清晰可闻的轻重机枪声，中间间隔很少，直到近天明始息。不知又是什么缘故。要不是琳儿未回，我早已回家去了。上午独自在家，突然想老家的大人孩子，又想起屋后球坝掉球的景况（注：作者家乡忠县系山城，楼房倚山而建，其老宅屋脊低于后面某银行的球场，时有篮球飞到屋顶打碎屋瓦，苦不堪言）。心里难受。我在这里精神上还不如在自己家里愉快。我巴不得一下就离开这里，但琳儿久无音讯，我不能不等她来一道走。十弟说两个娃儿下月初送托儿所。如到时不送还是缠住我，我就坚决进城。又重把储德来信看过一遍，看了似乎思想又稍安一点。

我这个人总是思想狭隘的。下午十弟说为了安全他决定去成都。两个娃儿送托儿所。我最好回家。陈琳以后回家由他负责送回。十弟又说最好明天就走。我说我不能一人先回忠县把陈琳丢在这里。不管怎么我坚决要候琳儿的消息

。要和她一道走。

整天不见公共客车往来，当然又发生了事故。天一黑就开始害怕，这样热的气候不免紧关窗户。但祝今夜能平安度过。

7.30

昨夜通宵未眠，一则为琳儿事思前想后，一则是早上零点刚过炮声和机枪声开始交响。当时睡的人还不很多，大家都跑到山头去看。我也去了，但只能辨别方向，没有看到火光。有的人也看到照明弹和燃烧弹。有次一颗炮弹的声音似乎朝着我们的方向来了。大家又是一阵奔跑。枪声一直断续发射到天明，据说是铜元局（注：系旧地名，在南岸区，八一五派控制的大型国防企业长江电工厂在该处，该厂生产的枪弹被大量用于武斗），又说是江北（注：江北区有主要由反到底派控制的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和长安机器厂等，生产的枪支、炮弹被大量用于武斗）。

7.31

昨夜又有炮弹声且极近，群众都未出去看了。中午去邮电局发电话，据邮局称电报电话均不通，如此则对琳儿情况更无从知悉矣。

给森儿一信写7月15日—7月31日零星小事。

8.1

写好两信，一交阿坝一交忠县，均写7月15日—31日小事。

昨夜10时以后即到处枪声四起迄至早上未停。据传西区公园路上有一老太婆和七小（注：重庆钢铁公司第七子弟小学）附近一老人中弹身死，另有受伤者。当炮火炽烈时，居民仍不少观望者。我睡在床上只听到吱吱的声音不时掠空而过。晚上杨家坪起火。我看了一下就回家了。

十弟决定明天去成都，两个孩子同时带去。他走后我当然不能住在这里。十弟说我愿住在渝钢村仍不进城，如要进城可带一二元去做零用。晚上商量至深夜。现火车只通到大渡口不进城了。

8.2

昨夜失火处延烧至今天早晨，幸火势不大。晚上炮弹声仍未停。十弟早饭前做好一切走的准备，并给我二元。我立即给家一信告已返城。早饭后送十弟至火车站，途中走失遂返来。在办公大楼下看有万县告急大字报一张。忠县情形如何不免令人悬念。我拟明天走进城，能否过得去还是一问题。

菜市上有一老者挑着两大捆行李，围着一大堆人。他是从杨家坪来的，他说昨夜失火处系杨家坪河南饭店（隔壁）收购废品处，共燃3间，是照明弹引火。因炮火炽烈无救火者。起火处楼上的人都用绳吊下来的。又说有一坦克开来，周围机枪围攻，后开至一高处，天明才开走。

开枪事件越来越激烈。以往只是晚上开枪，今天却是白天开枪了。无知的孩子们一会一齐拥上山头，一会狂奔乱跑，我看实在骇人。高玲珑去托儿所，据说亦飞去两粒子弹，弹壳竟达三寸长。中午杨家坪公路上开来三辆坦克，人们又拥至山凸争看，我也去看了。果然几辆坦克横卧路中清晰可见。寄回传单一束。

高玲珑从火车站回来，带回十弟一纸条并绘路线图：五哥，丢下了你我心实在难受。为安全计，一定不离开渝钢村。若要走可去大渡口搭火车（车费三角）。从渝钢村去约走一小时。如要回大渡口也可搭火车。现在搭火车人多可能还安全。看了十弟的条子眼泪又是一闷。十弟对我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手足”关系。

晚上邻居帅老伯谈，有二位险遭枪伤的人，一是上午渝钢村一卖菜的，一颗子弹把他面前摆起卖的南瓜打得粉碎，本人却毫无其事；一是前楼口有家人的小孩睡在床上，一颗子弹打伤了身上穿的背心，这孩子是平起睡的，如是侧起睡就伤了。险哉！险哉！晚上又见远处失火但不惊人。这几天听惯了炮弹声音，好像多了见惯不惊，而不像前两天一闻炮声即如惊弓之鸟。

8.3

昨晚似乎很平静，但邻居说仍旧打得很厉害，特别是天亮前炮弹从屋上掠空而过，卡嚓卡嚓的声音连续不断。大概是我睡着了。

上午去跃进村，飞炮二颗噼噼作响，我正走在高坡无躲处，又吓了一跳。

下午突然狂风大雨。天晴后山坡上乘凉的人更多，有位杨师傅和一位陈同志谈今天：1.市内也开了枪。2.去合川的客船被打沉。3.杨家坪坦克车触电被燃烧。一会又一位挑起担子的中年人路过渝钢村，手持弹头大家看。他是住在西区公园附近。

8.4

街上大字报说：中央军委已在研究制止武斗办法。这太好了，希能早日下达。

去邮电局问电报电话仍不通，返寓得两信。一是得玖、仁德 27 日来的，主要是得玖 19 日上午突然在办公室晕倒，失知觉只有几分钟。2.仁德拟上北京。3.得玖拟来渝复查。4.二妹拟来渝访友。另外关于家庭安排和琳儿无信也谈了一些。仁德来信主要是想去北京。另一信是懋芳八妹来的，她绘了简明路线叫陈琳定去玩。急复得玖一信，告目前不能来渝。仁德能去北京极支持。琨侄亦暂不来。布料不好买。琳儿仍无信。拟明日进城。

8.5

高玲珑说进城的火车通了，但邻居杨某明明进城未走通，火车仍只能开到九龙坡为止。有一姓陈女孩今日由城返渝钢村，她是经过石坪桥来的。在路上曾经多次被盘查，每次都是枪口对准胸膛，情况十分骇人。她说城内也是一片打枪声，朝天门也是架起机枪，嘉陵江大桥两端也是枪，开往合川的轮船也被岸上开枪射沉。市内情况十分严重。

我想，走就走，纵有危险也去试一试。8 点沿公路去大渡口火车站，买到去重庆的车票（3 角）。一会有持刀枪的青年来到车站寻找“敌人”，结果被带走六、七个。在卖票以前车站仍公布不卖票，有无重庆车还是一个问题。10 点左右成都车开来了，大家一拥而上。殊开至九龙坡，正遇对面开来一车，机头被乱枪击中，水箱打穿不能续开（注：302 次列车驶经九龙坡建设机床厂附近时遭到枪击，机车水箱被打坏）。被迫停于九龙坡。这一来我们的列车司机就不敢开车。一会万盛方面又开来一列车。三列车均停于九龙坡。约半小时车站公布

，前面枪声急密车不能开，乘客下车自行设法入城！初大家都观望不下。后无可奈何绝大多数下车走路。我亦下车开走。殊不知未行半公里，前面枪声如下雨一般响个不停。几千行人蜂拥后退我亦后退，在车站听候解决。不少人打电话去警司请解决问题。直到 4 点多车才续开重庆，人们无不提心吊胆听其自然，结果冒险开到重庆。

在火车上就听人说两路口至上清寺都架有机枪，更把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到站不少人即将离站，开往成都的乘客问前面打枪的情形。我又渴又饿不敢稍停，匆匆忙忙向上清寺走去，一上两路口果然路断人稀，边走边问偶有三五行人也是惊惊慌慌。一到李二哥家，正见他们将衣服行李包装成捆准备进防空洞。他们见我来了都惊问我来作甚。傍晚我亦随他们进防空洞，抗战后已 20 余年不尝此滋味了。据说今天广播公布居民如不进防空洞，则安全不负责任。

8.6

昨夜提心吊胆的过了一晚，主要是怕烧房子。今晨起床广播即大肆宣传双方已于今晨 0 时 40 分达成停止武斗协议（注：两派代表于零时 40 分达成《关于立即全面停止武斗的协议》，决定于本日 12 时无条件停火），大字报亦满街通贴，因此人心大安。上清寺街心花园顿时熙熙攘攘行人骤增，大家欢天喜地庆祝武斗停止。上清寺转角前晚为炮火轰击的大洞洞和二辆汽车（一司机当场击毙）也停放路旁。马路上遍地皆是玻砖渣滓，目睹者大谈经过。上午仍有炮声。协定规定从今天 12 点起生效，当然只有待下午，不过人们思想上是安定了。搬走的居民有的又陆续搬回来了。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交通仍未恢复，长途客运站仍堆满旅客。有的路费用完，有的找不着旅馆。邮电局今天依然关门未营业。解放军仍武装运粮入市。

今天是星期，森儿满 18 岁，谨祝他身体健康平安无恙。一天就在车站上，妄想能碰到一个从泸县来的人，问问泸县的情况，但怎么也碰不上有啥办法。

下午枪声又起但较稀疏，市体育馆闻有姐弟二人同时中弹身亡。晚上就地葬于体育馆中花园内。晚上街上听广播的人又多了起来，好像思想上已无惧意。防空洞已无一人。果如此下去则幸矣。

8.7

今日是伟德溺水2周年。越想越痛，唉！

早上街上行人不少。公共车仅开临江门一路在行驶，长途客车仍未开。为琳儿事思想总是不安。上午各铺店陆续开门，邮电局也开门了。我首先去发泸县电话，据答可以问一下，但把握不大。我高兴极了，心想马上就能问到泸县情况。谁知一会又答复我泸县电话电报均不通。不免怅然返李二哥家。我一下想起去问有无从泸县开来的木船。李二嫂当即告我可去菜园坝问问。我随即经两路口去菜园坝。好在今天很安静没有枪声。结果江边所停均是合江、乐山木船。有一船据说前天过泸县的，他（船工）说泸县问题已解决，3号停火4号交枪，其他情形不得而知。这如果属实则大幸矣。又顺便至火车站，各路车仍在售票。返途中遇忠县粮局张口杰，他是24日来的也是去泸县，弄得到去不来。我们在两路口摆谈一阵就分手了。下午忽传来枪声。据说是两路口电影院当门。中午我才在那里要真危险。又嘉陵江大桥一路过行人姓罗约40余岁，突被一群青年拳击身死。当抬至口腔医院急救亦无效。傍晚又有几辆满载武装架着机枪的卡车风驰过市。居民惶骇，入夜路上行人寥寥。

给得琼一信问琳儿情况。

8.8

今日立秋又下了雨。

天未明密集枪声不断传来，估计是在两路口一带。早饭后出街看大字报，正走至口腔医院门口，忽见后面人声嘈杂，纷纷从人行道涌退。我急忙回头一看却见有十余青年手持短枪对准前方汹汹而行。我当时不及躲避乱窜一民房中，正有一女人睡得正鼾，不得已又出来挤入一糖果店，该店不准进入乃紧逼而进。这时忽闻持枪者连发数响，心更骇。一会有人来说是抓的昨天在大桥故意打死二人的坏人，但炮是从空中发放。我见这些青年走远遂疾步而回，真是骇人。约半小时又出现同样情况。据说这几个人弄去是难以活出来的。

正午太阳正烈，街上行人一拥而至街口，特别是孩子更是叫喊不已。我出门一看，正好一部全新的装甲车和一辆重型坦克车从牛角沱方向驶来。我还是第一次逼近看，不过今天看是有些骇人的，装甲车和坦克车都子弹上膛，杀气

腾腾。下午四时又沿路开回。这说明今后武斗更会升级。下午五时远处传来大炮和机枪声，后有人说是重庆饭店楼上在打朝天门的轮船（注：本日下午，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以三艘改装舰艇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为杨家坪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沿途与东风造船厂及时称红港的朝天门码头等处八一五派武斗队交火，时称“八八海战”）。晚上还稍平静，仅体育馆方向打了几枪。有位张医生从小十字回来，他说昨晚到今晨小十字一带，临江门一带开枪很久，街上行人被打死的还露尸街口无人收尸。

有人说泸县前段时间还放了毒气，听了十分着急。琳儿的安全我整天无一个时候放下心，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晚上又下雨，气候特别舒适。入睡较早。（以上记于市内）

8.9

天明前又有枪声。早上 8 点又去邮局总局打电话，单已填钱已交，邮局并说要我发加急。我满以为可以发通了，殊知一会告诉我说通机厂无人接电话，这一来又算了。马上又发电报仍不收，只好又算了。

我决定于今日返大渡口，早饭后带着换洗衣服去火车站，沿途行人不少，也不怎么害怕。到火车站买票的人山人海，我的衣服包包几乎挤掉。上车后 11 点开，行至铜元局附近，忽闻枪声又起，车上人倚地而坐。有一从上海来的乘客说：从上海到重庆只有这里才像这样。另一乘客又说：刚才靠近火车站的菜园坝江边被乱枪打死一人伤一人皆女的，因闻枪声乱跑而中弹。想起我前天在菜园坝河边问船多吓人。又一口操泸县声音的乘客，我故靠近探问泸县情况。他说他是 7 月 30 日过泸的，他的家也在泸县，目前武斗已经停止，30 日双方即停止进攻，但仍对峙严阵以待。前段时间主要是二五团打炮，在三岩脑打伤一船。武斗地区是在市区内，蓝田坝河对面没有去。这一说我倒有些放心。他又说他路过时想回家都不可能（是一船夫）。他爱人是在蓝田坝下面过的河。总的说来目前不要紧了，交通已恢复了。但这毕竟是他的说法。结合早上在上清寺看的一张有关泸县的大字报，是说哪个部队支持哪一派，也提到打沉一船，看来是严重的。

返回大渡口，据说大渡口也将准备疏散。

8.10

给十弟信告近状，并将 27 日秀侄来信转去。高玲珑下班回来主动和我谈他们下午开会内容。又涉及到渝钢村的安全问题，最后一句才谈出“看你自己如何安排，往哪里走”。这一来弄得我瞠目无以对。我长叹了一口气说“反正来也来了，凭命闯嘛，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还有几个孩子未抚育成人，责任尚未終了。我思想上难过万分。

五点半广播忽然传来喜讯，说双方又签定协议（注：两派代表于凌晨 1 时达成《关于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抓被扣人员的协议（补充协议之三）》和《关于保证伤员正常治疗的协议（补充协议之四）》，定于 8 月 11 日即明天 12 时双方自行封存武器。并由警司成立工作组，警司任组长，双方各派一人任副组长。工作组双方各参加 7 人，办公在警司。从 11 日 12 时起，由工作组派人到各交通要道、港口、码头、车站等地驻守。检查往来车辆不准再运军火、武器。现有武器封存后听候处理。对 8 月 6 日停火后开枪的即着手调查，如有违抗者由警司严肃处理。这一来又有一线希望了。这次协议我认为比较具体。有解决的可能。但望能如协议实现则大幸矣。

晚上 10 点在渝钢村最末一栋屋的一口姓的（煤校学生）被武装押走。昨下午军官会门口停一被杀身死的 9 岁男孩，凶手亦仅 12 岁，是用刀戳穿颈部，原因不明。

8.11

早饭后去看大字报，且看今天 12 点后情况如何。

下午仍有炮声，但杨家坪一带已有人往来。停火并不完全可靠。

傍晚在山坡乘凉。有一泸县工人谈他有一同志今日汇款回泸县，邮局说不知何日可收到。按此泸县问题仍未解决。

8.12

昨夜通宵未睡熟，始而有人摆龙门阵，继而杨某回来大摆城内前夜嘉陵大桥对攻甚烈，有房屋被击毁。看来停火仍成问题。杨说泸县、万县都在打，宜宾也在打。泸县是停火后又打。真急人，琳儿问题思想上包袱太重，行路、睡觉、饭前、饭后都离不开她的影子，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上午曾打了几枪，下午很平静。去邮局问最近有无泸县邮件来，答久未得泸县来邮件矣。从多方证明泸县问题仍大。

下午病了，是天气太热的缘故，思想不安也是原因之一。

晚上杨家坪一巨型建筑失火了，烈烟一直缭绕到渝钢村附近，看来这栋房子面积不小。一群小孩在观火的同时还在奏乐唱歌，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又说市中区前天自来水打坏，全市无水居民都下河挑水（注：8月10日，江北反到底派炮击上清寺地区，供自来水厂用电的高压电线被打断，市中区停水9小时）。

这一天就想到陈琳，只要看见一个和她形影相近的人就好像是她。

8.13

我住在渝钢村平常没有人和我摆龙门阵，心里有事也无人商量，一天只是吃睡、撕藤藤菜（注：蕹菜，又称空心菜），这个日子太不好过，苦闷已极。

下午遥见市内浓烟如柱，据说是朝天门附近失火（注：8月11至13日，八一五派攻打设于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市交电公司大楼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广播站”，13日晨大楼三层楼内起火，烧至紧邻的化工原料公司、针纺公司等处，整幢大楼被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竟日仍断续听到炮声，尤以傍晚杨家坪一带为急，我在山坡乘凉只有退避回寓。夜10时有儿童一群以炸石砰砰作响，吓得不少人奔跑四散。

8.14

天明前大雷大雨，恰好在这个时候枪声又起，从声音辨别发枪处很近且越打越凶。我急忙起身关好窗户。似仍有起身依栏而望者。早饭后上街买小菜，

往来的人都在谈今晨打枪事，卖菜者谈他如何危险，人人都有自危感。

上午邮局送来成都寄给高玲珑一信。估计是十弟写的，但信壳上不是他的笔迹，也可能是高家三姐写的。今日重钢礼拜买肉者甚多。

独自苦闷无聊，何时才能同琳儿一道返家，一混出来已两个月，谁预料到会遇到交通成问题。整天枯坐斗室想谈谈心也无对象。要是琳儿早从泸县回来我也走了。我想等琳儿返来聚晤时定要痛哭一顿。

今天未闻枪声，但愿从此和平无事。

8.15

今晨 1 时到天亮枪声未绝，且愈打愈猛，枪声又很近。楼上还有人去山坡观望。今天亦断续有枪声。将近天黑我在渝钢村口乘凉。途中忽有青年数人持枪往渝钢村方向走去。群众哗然。尤以小孩窜挤看热闹。我生怕枪有失误，当逃往荣休队暂避。骇得我双脚发抖。返来听说高还出去找我去。怕我被抓去。其实怎么也抓不到我名下来。我是一个远地来看病的人，又无派别，观点也弄不清楚，抓我干什么。不过我胆小，一见有枪就毛骨悚然。

8.16

昨晚下半夜未闻枪声。

上午新山村一汽车碾死一小孩，当场毙命。写信两封分寄壤塘、忠县，约长六千字，什么都写上。下午革命组织来渝钢村抓坏人，我未去看，据说抓去一个坏头头。

昨(上半)夜枪声最密，声音最近。大炮发出似乎房屋有点轻微波动。晚上大家睡觉较早，9 点左右绝大部分宿舍灯火全灭。

8.17

昨夜今天都未响一枪，莫不是和平解决了。但夜饭后又响起枪来，地点在石坪桥一带。

早饭后去邮局交信，据答要 20 日后才设法送进城。汇款不收，电话电报不收。

晚饭后在渝钢村路口上围堆堆，不管认不认识，东拉西扯，主要是当前革命形势。一般讲的人都是从城里来的或消息灵通的。

有人说今天李家沱开枪打登陆艇，弹如雨下。过对河的老百姓吓得很凶。适火车通过这里，为要求停火拉汽笛约 10 分钟。讲话人是从弹子石进城没过到河，沿河上行直到马桑溪才过了河的。又一人说城里前天失火是烧的交电公司。他距那里只几十公尺远。他说城里到处都在打，主要是大炮打得凶。渝钢村商店和附近商店暂时没有盐巴、作料、菜油等物。居民不少去邻近乡镇购买，有的甚至走到白市驿。

我看到一颗大炮弹落在杨家坪附近的工业学院后面。当时一网硝烟腾空而起（一若失火然），不数分钟为风吹散。

8.18

早 6 点起身为高去医院挂号时炮声正隆，不知怎的今日枪声久久不息（注：从本日凌晨起，八一五派开始对大坪、潘家坪一带反到底派占据的重庆医学院、重庆河运学校、邮电器材厂、潘家坪高干招待所等地发起总攻，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等武器，死上百人）。

上午致乐至八哥一信，告以此地发电（报）困难，请他务必发长途电话或电报去问母和幺妹、陈琳的安全，如有结果立即发电忠县告平安，顺便亦谈到我钱票快完。

中午帅爷爷告我说：昨天下午有挑（溜水）的李老头说最近有人从泸县回来，说泸县打得凶，一次就死一千几。可惜昨天我未碰到。李老头住在马中附近，本想去问又因那一带太不安全不敢去。好在明天他要来。得此消息后心愈不安，这说明泸县比重庆严重。

我独自思考分析，如一次就死一千多人，地点决不会在对河而会在城里，但祝陈琳平安。不管怎样这人我非问到不行。

这个本本已成我唯一的亲人，心里有事只有对它讲。苦恼的时候也只有找它。说来说去还是想到陈琳，明天正好是她 19 岁的生日，再祝她平安平安。

杨家坪附近的潘家坪橡胶厂失火，从下午 3 时烧到晚 8 时，浓烟如柱。入夜

，下面（鱼鳅浩）方向发出一炮，先红光一闪，然后轰隆一声。6 时左右又有坦克 2 辆从杨家坪驶来，速度较快。群众齐拥山头争看。

8.19

今天是琳儿（旧历 7 月 14 日）生日，谨祝她平安无恙，安全归来。

晨起炮声犹未停息，我为了找这位李老头，还未吃饭就跑到马王中学那边去了。这一带是危险区。会见老头以后他却说是在马王场茶馆听一不认识的人摆的，只记得几句：小市一点事没有，城里打得凶，死了千把人以上，他是慢慢从下面走才出来的。这不解决我的思想问题。但可喜的是在城里打得凶，如然则南岸无问题，琳儿自然也就平安了。想到琳儿无消息万分难过，独坐沉思欲哭又止。我信手拈一字看看吉凶，当然这是一种封建思想，但在无法解决思想问题时也可以自慰一下。我翻到一个“全”字，这不用解是安全了。再翻一个是个“澤”字，这里面有幸运的幸字也好。从两个字来看是好的，没问题。

去邮局交乐至得谭八哥的信，邮局同志收信时说：什么时候发出不晓得，原说 20 日后发出又不行了。途中见有武装卡车数辆，架枪车厢如临大敌。胆小的我一见就骇住了。今晨有枪声，早饭后直至晚饭未听枪声。渝钢村上午有革命组织来抓“坏人”。有人说这一带可能还要狠打一场。我考虑很久到时决将我所有证件带在身边，无目的地外走，食宿靠当地政府救济解决。因走了绝路有啥办法。我又想去乐至八哥处，反正心乱得很，有话又无处讲。

今天是我来渝两周月。

8.20

昨夜有同村数人月色中谈最近形势。他们如临其境。建设(厂)又是怎么打的，空压(厂)又是怎么打的，哪里又怎么撤退，牺牲多少人（如说重大八一五牺牲 2 人，八二八〔注：重钢地区八一五派的一个中学生组织〕7 人，八一兵团〔注：重庆国防企业中的八一五派统一组织〕多少），受伤多少人，被俘多少人，又说哪一个团冲上去，另一团就跑了。又说八一兵团的总头头被一战士打死，参谋主张力保水塔，也被一战士打死，都是自己人打死的。谈得津津有味。我一人也不认识，只有听他们说，不敢问。看来大渡口保派内讧甚烈，很危险

。正谈话中一辆汽车开到村来，大家不敢去看，不知是装的什么。由于我思想不安根本睡不着觉，长此下去神经是会受到很大影响的。大约是午夜 2 点钟，在屋侧不远传来清脆的手枪声。我急忙起身把窗户关好，并轻轻出去关了就在门外的路灯。不久又响了几枪，一会机枪、大炮声不断向对坡（约距 400 公尺）七校（注：重庆钢铁公司第七子弟小学）攻来。不少人出去观望。一小孩为炮声震醒大哭大叫，其声至为凄然。

中午我买酒一两独酌，越想越伤心，什么时候才能同琳儿一道回家啊。

杨家坪方向不断向我们这个方向发炮，看来早迟要大打一场，到时怎么办呢？我想万不得已只有跑。

刚才（下午 3 点）有人说七校广播：周总理 11 点半来电（注：此说显然不实）：①军工井冈山（注：反到底派在重庆国防企业中的统一组织）一小撮混蛋操纵了重庆问题。②警司作好一切准备。③242 红总（注：后字 242 部队，即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即该校红色造反者总团，属反到底派）的所有枪支弹药一律交与 815 红色造反团。如属实则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入夜杨家坪方向面对七校开炮射击，一炮发出几颗红色炮弹像箭一般的飞向七校。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场面。不少人还久伫山头不肯离去。

（下期连载之三）

【故纸堆】

1976 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给一个外国留学生的大字报

按：著名汉学家、文革史专家、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沈迈克先生将他保存的一张大字报的电子文本交给本刊，并为之写下了如下文字：“这张大字报是 1976 年 7 月下旬，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给一个瑞典留学生贴的。这个留

学生在离开复旦以后，曾经在瑞典驻华大使馆当过两年文化参赞，并且在八十年代还当过瑞典驻越南河内市的名誉领事。后来，他给瑞典一家银行当驻华首席代表，至今仍在银行系统工作。在复旦留学时，他的主要兴趣是郭沫若早期的诗和五四运动。1976年春天，复旦一共才有十二个外国留学生，到了七月下旬，留在校园的就只剩下两个了，其中一个后来成了人类学教授的加拿大姑娘。我记得，大字报所描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自己正在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事后，那个肇事者当着中国学生的面，被迫做口头的自我批评。此事校方没有介入。当时，这张大字报贴在复旦四号楼内的墙上，四号楼是当年文学专业的中外学生的宿舍，现在早拆了。这张大字报的手抄件，我是1976年冬天从同学手中得到的，它被我一直保留至今。事情的经过，大字报已经交待清楚，无须赘述。也许，新的‘年轻的一代’中国大学生对它会有些许兴趣。”（沈迈克文，启之译）

叶××

我们不欢迎你

今天中午，在青年食堂买饭时，瑞典留学生叶 XX 自己将汤菜洒在地上。但是，他却反咬一口，赖身旁的一位中国同学碰了他，接着用力推了中国学生一掌，并极为恶劣地将地上的菜羹用脚猛踢到中国学生身上。这种野蛮的行为是我们不可容忍的，这是对中国人民极为不友好的表现。对此我们十分愤慨！

这种事情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我们记得：有一次中国同学在看电视，他就怒冲冲地喊叫起来：“小点声音，再小点！我们外国人是来留学的，不是来听音乐的”（其实当时的电视声音并不大）并气势汹汹的故意用脚踢撞纱门，向中国学生挑衅。还有一次中国同学在欢迎赴外地函授的同学胜利归来时，在楼下放了几个鞭炮，叶 XX 又一次杀气腾腾的跑到楼下，摆出一副流氓的架势质

问：“你们为什么要放炮？”俨然是一副要动武的样子，在中国的领土上难道我们连放及格鞭炮的权力也没有了吗！……

行了，够了！写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到，在旧中国外国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任意糟蹋中国人民的罪行。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二十几年前的中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过去的旧景决不能在中国重演。

中国人民和瑞典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这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叶××不能代表瑞典人民，也不能代表到中国来的全体留学生。中国人民是讲友好的，但是对于那种在中国领土上无理取闹和蓄意挑衅的行为，我们是决不让步的！我们警告叶××，你的这种无耻野蛮的行为必须立刻收敛。否则，一切后果，将由你来负责！我们强烈要求叶××向中国同学陪赔礼道歉！

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文系工农兵学员

1976.7.23

【简讯】

《青春无痕》已被韩国购买版权

湘 宾

湖南长沙文革亲历者、文革史学者陈益南的长篇文革回忆录《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生动回忆了他从一个 17 岁的学徒工参加造反并当上本单位造反组织负责人，以后又满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热忱参加武斗，并在 18 岁时成为公司革命委员会最年轻的副主任，直到文革结束后遭到清查，一度入狱的十年人生浮沉。书中对湖南省文革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风云人物都有详细记叙。该书于 2006 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凤凰周刊》及时作了积极的书评，称该书对目前为止的文革史，“填补了一个空白”，即回忆“工人造反派从造反到挨整的经历及文革中一系列事变对其思想上的冲击”的历史细节。文革史学者何蜀发表了书评《一部文革造反者心路历程的真实纪录》（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7 年 4 月号），认为“在已经出版和发表（包括在网上发表）的文革造反派回忆录中，《青春无痕》是对文革中造反派特别是青年

造反者的活动历史及其心路历程记载最为全面、详尽的一部。”《青春无痕》一书在海外也受到了关注。不久前，韩国一家出版社已正式购买了该书的韩文版权，翻译工作也基本完成，预计不久即将出版。

【小资料】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1968 年 4 月 8 日成立)

主任：

黎原，51岁，河南息县人，四十七军军长

副主任——

龙书金，58岁，湖南茶陵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员

华国锋，47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章伯森，54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

杨大易，50岁，四川苍溪人，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

刘顺文，55岁，解放军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校长

胡勇，32岁，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湖南长沙“工联”（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负责人，省革筹组成员

叶卫东，30岁，长沙市第一中学教师，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负责人，省革筹组成员，共青团员

常委——

刘善福，53岁，四十七军副军长

郑波，48岁，四十七军副军长

李振军，50岁，四十七军副政委

张立宪，50岁，湖南省军区副政委

张骥，46岁，原四十七军141师政委，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长沙市革委会主任，省革筹组成员

梁春阳，53岁，原湖南省经委副主任

万达，50岁，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孙云英，51岁，原中共长沙市委书记，现长沙市革委会副主任
张厚，49岁，山西交城人，原中共邵阳地委代理书记
王敬，44岁，原湖南省外贸局局长
唐忠富，34岁，长沙国营曙光电子管厂工人，长沙“工联”负责人，中共党员
尚春仁，42岁，原中共湖南省监委处长，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负责人，中共党员，省革筹组成员
梁玉吉，52岁，湖南日报社工人，“红色新闻兵”负责人，省革筹组成员
陈勇，25岁，中南矿冶学院学生，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省革筹组成员
李敬林，35岁，湖南省航运局船上指导员，“湘江风雷”负责人，中共党员
邹定国，22岁，湖南省水电厅设计院工人，孙大圣挺进军负责人，省革筹组成员
雷志忠，32岁，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干部，“工联”负责人，中共党员
金世钧，26岁，湘潭市航海俱乐部运动员，湘潭“红造联”负责人
许云秋，36岁，株洲市冶炼厂工人，株洲“工联”负责人
张万宏，51岁，会同县深冲林场党支部书记
江才香，女，21岁，湖南酃县人，酃县水口公社水中大队农民，民兵营长，广州军区军民双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

【编读往来】

1、陈家琪先生致函本刊，对文革提出独到的见解。编者不敢专私，特录于次，与诸君共享：

文革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毕竟具有着国际思潮的意味。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想赶上世界的步伐，革命的发生就是这种“想赶上”的一个表征。如果说1911、1949年的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领先的话，文革总是一件率先的事。当时的世界性思潮是什么？是文革影响了世界还是世界性的思潮影响了文革？除了时间上的先后（这是一种实证的研究）外，还有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即文革到底为

这一思潮提供了什么观念。总之，我不想把它完全理解为毛个人的或只具有中国特色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文革是一件具有连续性的事件，只不过把 1949 年以来的革命进一步深化了而已。但，它在什么意义上延续了五四传统(与传统文化决裂、改造国民性，造就新人等等)，又在什么意义上为今天的现实(且不谈改革的必然) 提供了前提(极度贫乏的物质生活后的穷奢极欲，宏大理想破灭后的虚无主义等等)，这些都需要研究。还有与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比较，甚至包括对发生在 1949 年的革命的重新认识。想摆脱贫困是革命的基本动因，但我们又没有财产所有权的观念，并不是为获得某种权利而奋斗。财产、身体、以后扩展为人权，在西方，这里面有一种逻辑的连续。总之，近来在读黑格尔的书，他说，法国革命，一是抽象的自由，二是没有找到一种宪政形式把革命所想确立的原则(比如自由、平等) 固定下来。我们这代人就是文革的产儿，这本身就说明了文革的意义，它也逼迫着我们重新思考文革所想确立的思想原则到底是什么，它不仅只是悲惨、迫害、胡闹、打倒之类的口号，它也想确立某种原则，当时说的是巴黎公社原则，但实际上，或者说在这一过程中，又空前绝后地体现出人性深处的某种更高要求。还有一些具体问题，比如现在把红卫兵等同于造反派，这是完全不对的。造反派有其特定含义，红卫兵也至少可以分出三类，最初的“红五类”，随后的造反派以及后来的“异端思潮”。他们各自的道德依据是什么？我想从正当性的角度来回答这一问题，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至于过激之类的行为则另当别论。这种正当性在什么意义上是我们传统文化自身所有的，在什么意义上又是革命的意识形态的体现，总之，话题很多，这是真正的对现代中国的认识。黑格尔说，这里就是罗托斯，就在这里跳吧，我们能跳成什么样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在

多大程度上把文革转化为一种理论资源。

2、余汝信先生来信指出，本刊第三期“小资料”所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中，阎仲川的“省军管会副参谋长”有误。应为“省军管会副主任”（省军管会不设副参谋长）；林李明的原职“省委书记”不够明确，应为“省委书记处书记”（不同于以后的省委书记）；孔石泉的籍贯重复了；刘继发似是“广州红旗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高翔应为“广州三司”（不是广东“红三司”）；武传斌应是“广州红司”负责人，不能算整个“广东‘红旗派’负责人”（旗派内又分为“红司”和“三司”两大派系）；林昌文应为广州（不是广东）“新一司”；易作才应为广州（不是广东）“红一司”。又，总派内中学生的“主义兵”也是主力。感谢余先生指正，并望知情者不吝赐教。

3、余汝信先生还指出，本刊所载资料应说明来源出处。本刊特此补遗：《记忆》已发表和将要发表的一些省级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系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存资料，以及该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的有关内容（名单中群众代表所在组织及派别情况根据当时小报、传单上的相关记载）综合整理而成。整理中出现的错误，有的属于录、校疏忽（如“省军管会副参谋长”），有的则是对具体情况了解不深所致（如群众组织及派别的称呼）。因先期成立的几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变动较大，资料缺乏，特别是各地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资料罕见记载。本刊切盼知情者提供详确资讯。以增史实，以匡讹误。

4、阎长贵先生看到《记忆》第三期的“编读往来”后，请本刊转告胡小水先生，《“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和来龙去脉》一文是他两年前撰写的，发表在《党史博览》2006年第10期。

5、单少杰先生惠赐大作《宗凤鸣先生谈赵紫阳思想》于本刊，其间言论，精彩纷呈，可圈可点。编者虽将其荐之于李树桥先生主办的电子刊物《赵紫阳生平思想研究》。但文中所述历史责任，于编者如高悬之鞭策。兹摘一斑于次，

俾与诸君共勉（编者与单先生有约，凡欲观其全豹者，皆可赐函本刊。）：

宗先生：赵紫阳搞政治改革是有理念的。这个理念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法制的国家。

单：这个理念也就是您老所说的赵紫阳的政治抱负吧。

宗先生：是的，是他的政治抱负，也是他的历史责任感。在与紫阳长期交往中，我能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紫阳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之所以在“六·四”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立场，一是认为自己没有错，一是因为“作为总书记，我必须有自己的态度，这是历史责任所在。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账”。

单：胡耀邦也说过，“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另外，刘少奇、彭德怀，还有更早的瞿秋白、陈独秀，也都说过类似的话。

不知您老还记得不记得，您老本人也说过有关历史责任感的话。晚辈曾问过您老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写《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这本书？为什么到了晚年还要费这么大的劲、冒这么大的风险？您老回答说，是出于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

宗先生：我觉着紫阳在软禁期间谈的许多话很有历史价值，既谈出了他亲身经历的许多史实，也谈出了他深思熟虑的许多看法，不记下来，太可惜了；因此，我有责任把他谈的这些话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

单：记得当时晚辈曾同您老谈过，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许多老共产党人早年信奉“洋教”，信奉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可是到了晚年，尤其是到了人生紧要关头，又回归传统，回归许多中国士大夫都遵循的精神传统，即敬畏历

史的精神传统。

宗先生：是的，这些老人大都很看重历史。

单：按晚辈的理解，这一精神传统的实质，就是坚守传统春秋史观，就是坚信历史具有终极价值意义，最终会对历史人物做出公正的评价。